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1月30日第31期 总第24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41期

### 地方文革专辑（五）

#### 【专稿】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稿·导言

张业赏 “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

#### 【书评】

黄玉梅 关于《柳铁文革大事件》中三件大事的补正

石名岗 高屋建瓴的五个问题——《平定县里不平定》前言读后

#### 【口述】

樊建政 整理 余子道、苏松柏口述

——“一步三回头”：我和朱永嘉一起去造反

#### 【人物】

杜莲子 齐晋华先生印象

#### 【综述】

启之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概述（节录）

——云南、山西、山东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杜钧福 山西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山西部分》补遗

杜钧福 山东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山东部分》补遗

#### 【封面】

邹行 集叶成环，喻之为冠

#### 【本刊声明】

【专稿】

## 云南文革史稿·导言

周孜仁

云南作为边疆省，自古以来，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显得很遥远。昆明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作者、清代诗人孙髯，联中论及滇史，曾引“宋挥玉斧”一典，其意盖云，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后，曾用玉斧在地舆图上沿大渡河一划，称“此外非吾所有也”。其后150年西南疆鲜有边患。元明以降，虽然中央政权驻军屯垦，官吏由“土官”改为“流官”（所谓“改土归流”），逐渐强化了对云南的统治，但毕竟山河阻隔，云南的社会、政治、经济一直与全国的政权中心相对疏离，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共建政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云南的经济、文化始终落后，其丰歉治乱对全国没有什么影响。直到1965年1月，第一条“通向国内”的铁路“贵昆路”才正式开通（原来仅有一条俗谚“云南十八怪”之一的“不通国内通国外”的滇越“米轨铁路”和一条更窄的，从锡城个旧通至盛产豆腐的石屏县的“寸轨铁路”）。昆明机床厂（前身为抗战时期建立的中央机器厂）曾被誉为“全国八大机床厂”之一，其拳头产品“坐标镗床”销往内地，尚需绕道越南，从海防港转运广西才能入境中国。据官方统计，1966年云南的工农业总产值47.5亿元，仅占全国的1.87%；财政收入5.4亿元，仅占全国的0.97%还少<sup>1</sup>。

但是，经济的落后丝毫不影响北京强大的政治辐射力和行政管理效率。老百姓说：北京打个喷嚏，云南就会感冒。更何况“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经文化的大瘟疫，传统、平和、温润的云南，虽山河遥远，又焉能不遭遇大感染、出现大疯狂、最后，演出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接见云南主要领导时明确称“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

<sup>1</sup>《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其时全国的经济总量：工农业总产值为2534亿元，财政收入为558.7亿元。

破坏的重灾区。”<sup>1</sup>此话不假，1966年到1976年，云南动乱的疯狂性、斗争的残酷性，群众间你死我活的仇讎厮杀，与其他省区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10年，三任半省委书记，二人凶死（闫红彦自杀，谭甫仁被暗杀），一人郁郁而终（周兴在全省动乱、尤其是滇南沙甸的军民武装大杀戮一个多月后郁郁而终）。贾启允被邓小平点将临危受命，不满一年，即因贾在批邓风潮中“变节”而于1976年的风云突变后落马，只能算得半任。而两大派群众，十年间一直在政治博弈中“翻烧饼”：先是恶斗3年，其中一派因“路线正确”稳掌大权7年，另一派落败，被“新生红色政权”以“划线战队”为由，以“群众专政”的形式实施镇压，造成冤假错案15000余件，打伤致残6.1万多人，迫害致死1.7万多人<sup>2</sup>。手握大权这一派曾经很自豪，说全国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除了上海，就只有云南了。1976年十月政变，“四人帮”垮台，云南政局重新洗牌，过去惨败的一派转而上台，完全掌握了对另一派绝对的罪责追溯权。这一次，他们名正言顺以国家暴力的名义对失败者进行大规模的“揭、批、查”。据《云南五十年大事记》记载，全省共清查“重大事件”1816起，全省进入县级以上机关的另一派群众代表，定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共7659人，分别被关押、审查、批斗。民间资料提供的数据则要大得多，据2017年3月10日原省妇联主任包亚芳等全省14个州市上访代表88人（均为入狱刑满的原群众组织领袖）写给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徐令义的申述报告<sup>3</sup>统计：“云南全省受到审查、批斗、办各种‘学习班’”共150多万人，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死刑2人。在整党“清理三种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无故清退回家等15万人。在审查期间，刑讯逼供打死、逼死、逼疯1000多人”对于主要的知名群众领袖，都进行了形式公开的“正义的审判”。本书附录全文照登了几则这些法律文书，在中国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重读这些判决书中囿于时代、囿于当时政治需要而难免用政治替代法律、以言定罪的荒唐可笑，不觉让人唏嘘。时过境迁，当年的荒诞激情与残忍互害早已烟消火灭，死难者的断碣残碑都付与了苍烟落照，

<sup>1</sup>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第418页。

<sup>2</sup>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第371页。

<sup>3</sup> 共有14个州市88名代表实名签字。

幸存的风云人物，则已风烛残年，只能在因生活困窘而不断上访与“维权”中消磨最后的生命。

文革结束40余年后的今天，云南的掌权者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改革进入深水区。文革的惨烈悲剧让人们对于政治实用主义的虚假和对主义的真伪莫辩荦然于心，再无兴趣。云南几千年曾经淳朴的民风旧俗不复存在，激情岁月的信念和理想亦随风远逝，唯有物质主义成为了最为现实亦最为诱人的奶酪，于是，短短几十年，云南就有了全国闻名的白恩培、高严、李嘉廷、仇和、孔垂柱、沈陪平、高劲松<sup>1</sup>等为代表的一长串大小贪官“塌方式”的倒台，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执政当局自己的头疼事多着呢，哪有工夫考虑他们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云南边疆当年的草民英雄，他们的问题本来就是历史酿成的，也就只能让历史去遗忘与评说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待自然规律去彻底了断他们的诉求。

同样，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也应该做的，就是将云南文革复杂惊悚的历史打捞起来、抢救下来，记录于纸，留给后世解读与评说，而不至于再如我们研究先人的历史，还得去寻觅古代墓穴与废墟，在艰难发掘的破砖碎瓦、断简残篇中寻找信息；当未来某一天，历史法庭将要对这一段荒诞、血腥和罪恶的岁月进行公开的审判，我们能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最可信的证词。■

---

<sup>1</sup> 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十年，2006年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高严，曾任云南省委书记。2002年负案潜逃且踪迹全无，民间传闻逃往澳大利亚，至今仍未缉拿归案（吊诡的是，高竟未上国家“红通”），200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公职，为外逃官员中级别最高者；李嘉廷、曾任云南省长，2001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仇和，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2016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孔垂柱，曾任云南省副省长，2014年3月，接受调查期间查出艾滋病，自杀既遂；沈陪平曾任孔垂柱秘书，后为云南省副省长，2015年，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高劲松，曾任昆明市委书记。2017年，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专稿】

## “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

张业赏

1967年山东“二三夺权”建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后，山师红卫兵主要有两派：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和济南红卫兵师的一支主力山师红旗红卫兵。另外还有八一八、八一战斗队的小型组织。谭启龙等倒台后，山师红旗红卫兵销声匿迹。二三夺权后，各单位进行实现所谓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的大联合、大统一。这是解放军已进驻各学校。山东师范学院当时有四个主要组织，为实现联合，成立了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临时服务组，具体负责大联合的工作，实现三结合。为了为大联合做准备，红卫兵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时间是1967年3月17日至3月25日。解放军也予以支持。《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临时服务组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决定》称：“通过整风，打一场向私字开火的人民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我们队伍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为我院的大夺权奠定一个良好可靠的思想基础。”整风的内容是：“彻底批判和纠正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解决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彻底批判和纠正骄傲自满和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击一切的错误思想，解决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彻底批判和纠正关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解决正确对待犯过错误或受过蒙蔽的同志的问题。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应以革命组织的各级负责同志，特别是总部负责同志为主。”

关于整风的方法规定：向解放军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联系实际，对照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体可以按一下三步进行：

（一）学习文件：根据整风内容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三七指示）。认真学

习《红旗》杂志三、四、五期社论，《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以及《文汇报》发表的《造反不分先后》、《搞臭风头主义》|《搞臭小团体主义》、《为革命干部的“亮相”喝彩》等文章。

（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自我批评，自觉革命。互相批评时要切实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办事。

（三）开讲用会，进行群众性的整风总结。整风最后一天，以系为单位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请在这次整风中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解决问题比较好的同志，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作为整风学习的总结。

各班系应根据这一精神和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各革命组织的中心服务组同志，在一起进行整风学习，每班派一名代表参加。整风开始的第一天，各班系先给中心服务组提意见，以便各班代表把群众的意见带上来。

文化楼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各级干部，也要以部门为单位，带着各自的问题和活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

3月18日，济南部队驻山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何队长在全院整风动员大会上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门整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讲话。（讲话内容已经复印，写作时参考）在实行大联合的过程中，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济南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3月27日散发的传单中说：“在学校就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在目前的形势下，实行不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是检验一个革命组织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试金石。”

在整风之后，3月27、28日，山师红卫兵进行了红卫兵组织选举工作。从开始选举到出选举结果共十九个小时，即从3月27日晚7点到28日下午2点。（反对大联合的山师串联红卫兵认为）选举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候选名单由各系一次推选出来，其他系并未参加意见；第二，候选人就全院范围讲有相当一部分是群众所不了解的，不熟悉的，甚至有的人都不认识。

大联合造成了山师串联红卫兵的分裂。串联红卫兵指挥部总部主张联合，但以王竹泉为首的激进派却反对联合，唯我独革，认为和社会上一样，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围绕是否联合双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双方都给对方带了不少的大帽子。他们在合并、整风、选举、反击逆流等问题存在原则分歧，其中又是以合并为核心的。（关于此问题复印的材料上有）激进的一方认为，串联总部的负责人进行大联合是上当受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势必带来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可是在我院，从表面上看，却异常的平静。而党委内一些面目不清的人物却频繁来往和交游串联总部、八一八总部的某些负责人，不住声的吹捧赞颂。而总部某些负责人也四处放风某某某 有魄力，有能力呀，某某某忠诚老实呀，从不去发动群众审查干部，这说明了什么？而明显的是串联总部某些负责人，迎合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以保皇为罪名，强行解散了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组织《新愚公》，而党委内部面目不清的人物高举双手‘拥护串联总部的英明决定’。”（1967年4月11日彻底埋葬右倾机会主义一简论我院目前时期的阶级斗争山东师院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击退逆流”战斗队）。攻击总部负责人麻痹大意。1967年4月1日文革串联惩腐恶战斗队云水怒支队的一张大字报说“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由于胜利流露了和平麻痹思想，我院还明明没有夺权，却认为大权在握，没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相当严重。阶级敌人把我们文革串联这个整体革掉了一块，他却麻木不仁，无知无觉。同志们向他大喝一声‘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你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他却认为你草木皆兵，夸大了敌情，甚至说什么‘何必动用一师人马去打一个班？’

对于王竹泉等人，主张合并的组织和人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关于大合并的第一次呼吁中，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声称：“谁不同意合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别有用心，就是百分之百的糊涂虫”。主张合并的组织到社会上散发传单，大造舆论。批判激进派是“唯我革命”、“山头主义”。还贴出了“炮轰王竹泉”的大字报。断言“我院在大联合大夺权



中的阻力不是来自‘八.一八’、‘八一’、‘广播’三个革命组织”，“是来自文革串联中以王竹泉为首的一小撮分裂主义者”。王竹泉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肆意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哺育起来的世界第一流的解放军。”（文革串联驱虎豹战斗队三支队：《炮轰王竹泉代表了一种什么思潮一评大字报炮轰王竹泉》1967年4月）。

王竹泉等一派唯我独左的思想，不能很好的相信大多数，认为三个组织合并是个大阴谋，是“借合并之名，行抢权之实”，“三个组织是反革命复辟的群众基础”，“广播站在为反革命逆流制造舆论”，进行所谓反击逆流。“主张反逆流的都被当成唯我革命打了。”

（1967年4月1日《对目前争论的几点看法》中63-1 千钧棒一支队、二支队、五支队、六支队）。实际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主要反映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与济南军区之间的斗争。在山东夺权之后，中央发出三支两军的指示，军队开始进驻地方单位，并在许多单位掌握了由于原来干部被揪斗而空出的权力。造反派虽夺去了胜利的大权，但由于其缺乏组织性并没有能够很快掌握各单位或各地区的权力，这也是夺权后山东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就是当时有人提出“为什么解放军进驻我院前后有那么多谣言？如解放军支持捍卫队！“串连攻击解放军！”“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挑拨革命群众与解放军的关系！”等疑问。

王竹泉们声称自己是“老造反”，要掌权。“老造反受到二刘一王的压迫最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最甚，因而反抗力最强、斗争最坚决。因此他们是我院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之又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受压迫的革命群众，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作为阶级对立来讲，左派对右派是半点也不客气的，左派就是要将右派置于死地而后快，因而二王一刘最害怕老造反。他们晓得老造反上了台，没有他们的好日子过。要斗垮二刘一王，搞好斗批改，不能离开老造反。老造反必须登上我院的政治舞台，必须树立老造反的权威！老造反必须夺权！”（《论山东师院的夺权斗争》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 1967年4月12日）

王竹泉等在二三夺权后的大合并、大联合时，提出在大联合中要以文革串联为核心，

要树立文革串联的威信。面对炮轰王竹泉的大字报，串联总部的负责人认为大字报是好的，是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结果被指责为“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不惜抽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灵魂搞合二而一。并且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踢开我院革命力量骨干老造反，召开了代表一部分战士合并的臭名昭著的胜利会师大会，于是，一支依靠中间派、团结保守派、排斥革命派的队伍形成了，那些保守派泥瓦匠的威信大大树立起来。”（同上）王竹泉渔串联总部某些人的分歧由来已久。第一次整风某某某要求在家的人搞人人过关，王竹泉则强调从实际斗争中，在路线斗争上解决问题，这引起了极强烈的争论。此后，对于问题的看法，王竹泉与总部中某些人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达到今天根本对立的地步。后来王竹泉一派离开文革串联指挥部，成立了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

（文革串联总部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济南柴油机厂是保守势力夺权，厂革委会对该厂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制造白色恐怖。柴油机厂的工人多次到我校要求文革串联去该厂支援，然而却得不到支持。柴油机厂革委会企图以借用我们的大礼堂来进一步压制工人，招摇撞骗，对着造反派的工人说：文革串联不支持你们，而支持我们。）文革串联总部把大礼堂借给了厂革委会。）

在大联合之后，老造反派声称必须分裂，重新组合。他们说：“在我们山东师院老造反们扬眉吐气的日子是有过的，去年十一四以后，老造反们真正挺起了胸脯，雄赳赳、气昂昂，今年战败了山大主义兵和工人联合会一小撮以后，老造反们在欢庆山东红色政权时高兴得跳起来，唱起来，那时，山东师院确实是老造反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天下。现在老造反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权，重新受压抑了。丢了权怎么办？夺！夺！夺！重新夺回来！”老造反的破坏大联合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对老造反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我相信你们胜利。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杀出来，这样做不太符合大联合、大夺权的大方向，应该内部辩论，实行改组总部。”

《新愚公》是二三夺权后在山东师院起重要作用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在文革前

主持及支持院党委的中层干部，占领着学校党委、行政、人事处、各系总支等要害部门。在二刘一王遭到批判以后，他们也打着造反的旗号给党委写大字报。但其矛头指向了对原来院党委有意见分歧的张维冷。原来院党委根据工作需要，拟在二三年内提拔一些干部，年龄都在35岁以下，共39人。陈香亭对此事曾说过：“运动前我们给省委的报告中谈到一个顾虑即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将来来了运动那些平时对各位口秀心甜的人会刮起大飓风，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顶不住。这次运动刮了一点飓风，可是被广大革命同志的铁扫帚扑灭了，顶住了……”（《砸烂二刘一王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新愚公究竟是什么货色？”第一集》“炮打文革楼”联络站材料组1967年6月5日）知道这件事的很少，被造反派称为绝密材料。知情者对此大多守口如瓶，或者避而不谈。张维冷却把这个问题揭了出来，结果遭到知情者的强烈反对。称张维冷挑动群众斗群众，耍阴谋，又一方面把39人名单说成是450人。1966年6月14日，黄敏、陈香亭、李克信召集党委、院行政两支部部分党员，把斗争矛头指向张维冷，贴出了把矛头指向党委的大字报。之后在运动中依次为资本，树立自己的形象。称“我们是文革楼最先起来造反的，使工作组把我们打成了保皇派。”（同上）1966年6月24日，陈香亭写信给李芸生、蓝名述谈到614大字报的评价问题说：“文化楼三十几位革命同志揭发刘砥石、刘明凡镇压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是革命的行动，绝不是像张维冷说得那样是黑帮分子的反扑。”（同上）

关于39人名单，听了蒋南翔报告的陈香亭回去作了传达。文革风潮起后，陈香亭1966年9月6日曾给董子宜、张维冷写过一封信，谈对这些敏感问题的看法。原信如下：

董子宜、张维冷同志：

有三个问题，一是反修审干的情况，二是新生力量培养名单，三是常委在讨论干部时谁同意谁、不同意谁的意见如何。这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我向李芸生、蓝名述同志面交待过，后一个问题我准备自己背黑锅，我承担责任，不准备说任何表明自己的话，这是党的利益所在。因此这个问题任何人未交待。上述三个问题支部逼我写大字报或口头交待，我

始终未交待，总是吞吞吐吐过去了。现将处级以上干部名单交您，我不存了。至于其他方面的培养名单在张金梅手里，我就不再转手交待了。

此致

敬礼

陈香亭

1966年9月6日

张维冷看了信后，表示名单是黑材料，可以公开，以便批判秦和珍、二刘一王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而董子宜则坚决不交。新愚公中的人也为董子宜、张维冷奔走游说，拼命保这份黑名单。结果在对院领导进行批判时，不同观点的人对董、张的态度也截然不同。1966年12月份，董子宜写了一份检查，鸣凤山把党委行政人事部的人召集起来，说“大家提提意见，弄出个像样的检查来，好早同学中通过。”新愚公迟寿云亲自给董子宜的检查加了按语，认为董的检查基本上触及了灵魂。对于张维冷的检查，在讨论时，迟公、吴公、蔡公大叫道：“他的检查根本不能印，放毒，别叫他蒙蔽了大家！”在张的检查按语中写道：“张的检查很不像样子，现抄出来，供革命师生批判。”

在批判董子宜的会上，当别人揭发到董亲手签发九个同志材料报公安厅的事时，有人叫他交待，迟公忙说：“坐下、坐下，继续揭发。”有意把这个问题回避。在看对张维冷的批判会，气氛紧张，态度严肃，众愚公怒发冲冠，不怕你张维冷不服。回忆起愚公们对张的斗争，在回忆红旗兵、赤卫队对他的斗争，在回忆旧省委要把他打成右派、反革命，有着多么微笑微妙的关系！

在大联合中，造反派彻底失势，山师权力被原来的干部掌握，造反的学生实际上被排斥在外，因而对大联合不满，导致山师串联指挥部的分裂，结果新愚公在串联分裂之际，重新进入文革串联指挥部。“新愚公不是坚定的左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它是二刘一王一董体系的代表，是董子宜操纵的御林军”，他们施展了外革内保，明革暗保，假

革真保的绝技，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装扮成革命的左派，两次钻进文革串联。其中：迟寿云做了院革委会的委员，控制着党政财文一切大权，过去受二刘一王及其帮凶压制的干部仍然受压制，他们是文化楼的实权派，领导干部也要听他的裁判。（《新愚公假革命真保皇的九张王牌》炮打文革楼联络站材料组 1967年6月5日）

1967年4月8日文革串联分裂，指挥部从串总中杀出来。

炮打文革楼联络站于1967年5月29日正式成立，它包括7个系的文革串联分布和其他四个系的许多战斗队。文革楼问题成了山东师院斗争的焦点，成了运动的关键。■

2018年6月22日

## 【书评】

### 关于《柳铁文革大事件》中三件大事的补正

黄玉梅

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1988年12月完成，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是一部珍贵的地方文革资料。全书分“大事记”和“大事件”两大部分，“大事记”部分概括了各地文革全貌，“大事件”则较为详尽的叙述了各地较大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等的全过程。编撰者的权威性，使这套资料在史学界和关心历史真相的人们心中，具有很重的分量。

但是，笔者最近读到该资料的柳铁部分《柳铁文革大事件》和《柳铁文革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件》和《大事记》），却感到它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遗漏和误差。<sup>1</sup>作为以真实和客观为基本特征，甚至为生命的历史资料，对此不容忽视。否则以讹传讹，使后来者对历史的认识产生误差。

作为柳州铁路地区文革亲历者，也是广西文革历史的关注者，笔者对此深感忧虑。为

<sup>1</sup> 笔者是柳铁文革的亲历者和关注者。

了对历史负责，不揣浅陋，对其中的存疑之处，通过查阅资料，寻访当事人，作了尽可能的补充订正。现择其影响较大的三件大事，将补正文字呈献如下：

## 一 “八三”武斗杀人事件

1967年的““八三”事件”，是柳铁地区第一起恶性武斗杀人事件。它增强了两派的对立，极大地恶化了形势。但《大事记》对其基本事实的记述多有改变，而《大事件》没有将其收入。

《大事记》的8月3日条对“八三”事件是这样叙述的：

上午，柳铁“东方红公社”宣传队的舒怀平、常宏声等8名队员和柳铁一中“联合战队”的红卫兵汤中纯等3人，在柳州火车站前米粉店吃米粉时，因“东方红公社”的学生宿舍被抄问题发生口角扭打。“联合战队”的红卫兵跑回“工机联”总部报告。尔后，总部的刘重阳、李仲领带领工人、学生百余人攻打“思想总部”所在地局党校。这时，双方总部都调动本派群众百多人，手拿长矛、大刀和棍棒等武斗器械前来增援。这次武斗，造成死亡一人（红卫兵胡超亮）伤多人的严重后果。（67年“联指”大事记第三本，局核办第二卷）

此条文字的叙述从起因到过程，全部失实。事情起因是这样的：8月三日早上，柳铁一中“联合战队”的红卫兵窦立人和黄伟强，借了照相机，到铁路局大食堂旁去拍大字报。被钢联指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绑架到钢联指总部所在地铁路局党校。随即目睹者回铁一中（当时铁一中是联战驻地，也是黄、窦两人的住地和出发地）报信。<sup>1</sup>

过程：住在铁一中的联战学生得知窦、黄二人被绑架后，由于之前两派学生均是口头

<sup>1</sup> 之前窦、黄两人和东方红公社成员是否有口角尚不明确，似有可能。

争斗，这是首次遭遇绑架事件，又因为党校是钢联指总部，大家感到事情危急。窦、黄二人所在战斗队便叫了十几个同学到党校救援。去的人全部赤手空拳（当时联战没有任何武器）。《大事记》所说的“‘联合战队’的红卫兵跑回‘工机联’总部报告。尔后，双方总部都调动本派群众百多人，手拿长矛、大刀和棍棒等武斗器械前来增援”，全系不实之词。“八三”事件自始至终均无人告知工机联总部（他们事后才知道）。真相是：联战救援人员一行到达党校后，即进入一楼房间，寻找被抓捕的窦、黄二同学。随即涌来了大批全副武装联指武斗人员（全系工人），一律大刀长矛棍棒，围堵刺杀联战学生。在场的解放军极力阻挡，留出南边一条路，使联战学生得以撤退。但终被刺死一人（胡超亮），刺伤三人（汤宗纯，王匡，葛自牧），全是联战学生。<sup>1</sup>

综上所述，“八三”事件完全由联指一方挑起，联指一方的武装人员杀人伤人的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大事件》的叙述，违背了历史真实。而改变了基本事实，也就改变了事情的性质。

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重大事件，在《大事记》中仅有寥寥几句，而在《大事件》则只字全无。

## 二 关于张炎同志受迫害及“张炎黑司令部”事件

张炎是柳州铁路局原政委、党委书记，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遭受批斗五十余场，被关押八年，失去自由十余年。应该说，《大事件》中的张炎条目，陈述了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的精心炮制、罗织资料，迫害张炎的基本事实及对他们的有关处理，整体上维持了处遗工作的成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某些判断不够准确，一些重要细节有错漏等问题。

1. 原文第四页，1—2行：……在局、处两级干部“爆炸会”后，在柳局的干部、工人

---

<sup>1</sup> “八三”事件当事者葛自牧、黄伟强的口述。

和家属、学生中，形成了对张炎、孙连捷两名局领导干部“革”与“保”的对象……

末尾两字“对象”应系“现象”之误。原句表意不明。依照本句上下文意思，原意似应为：在局、处两级干部“爆炸会”后，柳局的干部、工人和家属、学生，对两名局领导干部，有的要打倒张炎，支持孙连捷站出来闹革命，有的反之。以此为分水岭，形成“革”与“保”两大派。按照句子前后的对应关系，它隐含的判断是，要打倒张炎的，是“革”（按文革的说法，是造反派），而支持张炎站出来闹革命的，是“保”。

这种判断，是武断的，主观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精神。文革中两大派，对领导干部，各有所支持，有所反对，这不是划分群众组织性质的标准。1967年11月8日，毛泽东批发的《中央关于处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中，将广西两派都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而按照1983年中央处遗小组的定性，两派都是造反派。

《大事件》这种叙述中对派别性质的判断，流露出的是派性立场。在距离文革发生已经21年（1966——该资料的成书1987年），在官修的历史资料中出现这样的问题，令人警醒。

2. 该文第四段第五行：“……7月21日，张炎在桂林发表支持“工机联”群众组织的“亮相声明”

张炎这次亮相，是在征得局党委会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sup>1</sup>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

3. 该文第四段，第9—10行：……张炎从桂林回柳州后，住进了“工机联”的据点柳铁文化宫。

此句的叙述不合事实。张炎在7月21日亮相后，即从桂林回到柳州。当时他的家已被联指东方红公社多次抄家，洗劫一空，东西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丢进污水中浸泡。张炎回柳铁后，已无处居住，先是到机车车辆厂（属铁道部）挤在他妻子（其妻系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厂里给了她一间小屋午休）那里。后来房子越换越小，只能仅仅放一张单身床，张炎就只能到处打游击。曾到机务段等地住过。1968年2月初，携妻子一起，住进

<sup>1</sup> 张炎的大女儿张小路的谈话（2018年3月间）



了工人文化宫当时联合战队宣传组旁边的一间空屋（他的小女儿住在宣传组）。当时工机联头头们已不在文化宫活动。

2月24日，铁路局军管会通知他到军管会报到，他按时前往，到铁路局前门时，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东方红公社社员抓捕，绑架到联指据点柳铁技术馆关押，批斗。后在5月六日，被柳铁军管会押送北京。实际张炎住在文化宫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张炎从桂林回柳铁后，和工机联头头们完全没有接触时间，他被军管会上报中央所指斥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罪名完全系诬陷。《大事记》把张炎住进文化宫的时间大大提前，给了诬陷张炎，罗织罪名的人们以想象空间，或者说，给了编造张炎罪名的人以可能性的支持。

4. 该文第十一段，第一行——第五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的方针，局党委本应及时对张炎作出平反的决定，但由于局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和某些领导同志，错误地认为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使张炎同志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拖延对张炎的平反，是局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出于私利，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对抗。《大事件》的这种说法，似乎是“局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和某些领导同志”顾忌到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不便给张炎平反，或者是考虑到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不该给张炎平反，把责任推到周总理点名上。

所谓“被周总理点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份《大事记》的第11段写到：

柳铁军管会于1968年4月21日和5月4日，先后两次向中央写了“柳州铁路局政委张炎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张炎有“特嫌”、“托派嫌疑”、“挑动群众斗群众”，“请批准并利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大会，宣布对张炎采取监护审查”的意见。5月6日，张炎被军管会武装押送北京。5月12日晚，周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点了张炎的名：“听说你们要把他送到温玉成那里去是不是？（答是）好，我们欢迎，这个人在柳州起了不好的作用。”

这里《大事件》也明确承认，柳铁军管会两次向中央写信，诬告张炎。当时全国乱成一团糟，像张炎这样被诬陷、被罗织罪名的干部全国不知多少，周总理日理万机，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不可能逐人去调查，全国又是军管状态，他听信军管会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孰因孰果，一目了然。《大事记》在这里颠倒了因果，为制造张炎冤案，阻碍张炎平反的人文过饰非。

### 三 “5.21”、“5.25”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枪支事件

“5.21”所谓“5.21”、抢夺援越物资和“5.25”抢夺解放军枪支事件，是柳铁地区文革期间两件重大事件，也是随后促使“七三布告”公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柳铁地区造反派骨干分子被抓捕收监的主要罪名。但是，经过多年严酷的审查，证明此事并没有事先的策划，而是在当时危急的大环境下，临时发生的随机行为。所谓“援越物资”，亦被证明不实。故在后来的处遗工作中，未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大事件》在此事件的叙述中，多有不实。

#### 1. 涉及柳州市原造反大军主要负责人白鉴平的四处：

原文第1部分“事件起因”第一段：“1968年4月16~18日，由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主持，在柳州召开三市一局（南宁、柳州、桂林、柳铁）会议，白鉴平、李振岭（柳铁“工机联”总部头头）在会上提出‘形势一触即发，要准备大打’”。

本段第7行—第9行：“5月中旬，白鉴平、廖伟然（市“造反大军”头头）再次同李振岭联系，白提出，“地方要和铁路打成一片，现在说互相不介入只是一句空话，铁路一中断，中央就要表态”。这样，在抢夺武器弹药方面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原文第2部分、“事件的经过”第8行“……晚上又继续开会。白鉴平等人也来参加，李振岭征求白的意见，白说：“到什么时候了？有枪就抢，打成反革命我们当，干吧！”

原文第2部分、“事件的经过”第3段：第1—2行：“19日继续开会研究。会上，

白鉴平说：“你们好好侦察，军列肯定会有，大胆去抢，是援越物资也要抢”。

“5.21”、“5.25”事件发生在柳铁地区，柳铁地区的造反派工机联和柳州市的造反派只是观点大致相同，组织上联系甚少。白鉴平系柳州市造反大军负责人，与整个“5.21”“5.25”事件毫无关系，从未有任何参与。<sup>1</sup>

联系下文，白鉴平被定为“5.21”“5.25”事件的首犯，可知以上这貌似有眉有眼的四条“事实”，均系为了打成这一冤案的精心构陷。为此，白鉴平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坐满十五年）。在艰难的牢狱环境中，一直不停地顽强申诉。<sup>2</sup>

2. 原文第1部分“事件起因”第一段第4行——5行：“……5月7日，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在柳铁林场开会，由从北京回来的柳州市代表覃文彩作所谓形势报告”据当事者王反修说，没有此事，没有此事，不知道谁是覃文彩。<sup>3</sup>

3. 原文第二部分“事情经过”第一段：

为了抢劫武器弹药，柳铁“工机联”总部四出派人侦察和了解军列情况。5月17日，9257次军列从衡阳进入冷水滩口（柳局范围）。16日，桂叔林（局办秘书派头头）在柳铁一中向李振岭报告，“冷水滩方向有军列来，抢不抢？”李告知再行侦察。于是，桂即派柳州车站驻冷冻厂的陈太宇、程荣、唐诘到538编组站侦察，钱文俊（“联合战队”主要头头）派袁桂生、汤忠纯到车辆段化装成列检人员实地侦察，张德明、邱文润、刘明亮、佐余光等人都参与了侦察活动。

这段系编造，“5.21”是由于下面有人在柳州车站发现了军车。报告总部，后临时研究决定的行为，不是有预谋的行为。<sup>4</sup>

<sup>1</sup> “5.21”“5.25”事件的主要参与人王反修的口述。

<sup>2</sup> 见《白鉴平申诉材料（手写本）》。

<sup>3</sup> 王反修口述（2018年3月14日）

<sup>4</sup> 王反修口述（2018年3月14日）

#### 4. 原文第二部分“事情经过”第四段：

24日上午，局军管会副主任曹银忠将强行收缴的消息向王反修透露说：“你们抢的太多了，不交一点是不行的，部队也不会答应，到时候强行收缴，也是要交，那就被动了。”下午，李振岭、王反修在林场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振岭、王反修、李旺生、周彪、李选凤、李崇泰、钱文俊、王立和、邱文润、桂叔林、王明松、张德明、潘秀等人。会议由李振岭主持，讨论中心问题是：抢的援越子弹交不交？不交，强行收缴怎么办？讨论中，李振岭、李选凤、李旺生三人不同意交。王反修说：“我也不同意交，就是交也要有条件，一是全面制止武斗，两派一起上交；二是动员民兵出城。”桂叔林说：“我们不能说一颗子弹不能交，解放军问的时候，我们还是答应交，但可以提一些条件，他要办得到就交，办不到就不交。条件：一是全面制止武斗，两派一起交；二是动员农民出城；三是释放被打的人；四是承认‘4·20’是革命行动，取消‘4·21’责令（4月20日，市‘造反大军’在车波口扣留参加柳江县‘三代’会代表乘坐的两辆汽车和随车上缴国库的74000元现金，并打死一人。21日，柳州市警备司令部发出责令其交出人、财、物等），这样我们讲话就主动了”。最后，一致意见要提出条件，由王反修、李振岭、钱文俊负责谈判。王反修说：“提出的条件解放军不答应，还是要强行收缴怎么办？”李振岭说：“强行收缴不通过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去把他们拦住，进都进不到我们的地盘，他收个屁呀！”钱文俊说：“这还用发动，到时候老百姓自己也会去”。邱文润说：“他们如果强行收缴，婆婆妈妈的都上去，和他们辩论，这个办法最好”。王反修又提出，“要是武装收缴怎么办？”李选凤、李旺生等人说：“解放军来武装收缴，我们连枪都将他们的抢了”。邱文润说：“现在有米没有鸡，带枪来正好”。王反修提出：“现在可以先做好准备，赶紧把子弹藏好，该分散的分散，该埋的埋”。李振岭最后说：“这个问题就这样，回头我和大军再商量一下，统一口径”。会后，王反修、桂叔林、王明松、张德明、钱文俊、邱文润等人分别对所属组织作了传达和布置。

这段文字，基本情节都不真实。（1）“5.21”之后，军管会副主任曹银忠动员王反修等交回抢去的子弹，说你们抢的太多了，不交是不行的，至少要上交一部分……”但没有透露要强行收缴的消息。这是广州军区的直接部署，他也不可能事先知道。（2）下文所谓工机联头头们开会，研究对付强行收缴，也完全是编造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会单边收缴子弹，因为两派当时都抢了枪支弹药，钢联指抢得更多，而中央定性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也就不可能研究怎样对付军队的强行收缴。<sup>1</sup>

5. 原文第二部分“事情经过”第五段：

24日夜、25日凌晨，6985部队奉令进入机务段、铁一中、冷冻厂、538一带，收缴部队的首长在机务段会见了王反修、肖贻堃、李选凤、杨雨水、桂叔林、邱文润、邓承刚等派头头，动员他们交出抢去的子弹。王反修、桂叔林竟说：“解放军受了蒙蔽，镇压造反派”。接着邱文润、王明松带了几个人冲进会场，大喊大叫，辱骂解放军。邱、王还撕开衣服，拍着胸膛叫嚷：“朝这里开枪吧”。王反修等人趁机溜出会场，谈判无结果。

事实是，25日凌晨，前来收缴子弹的解放军部队，一清早就把工机联的驻地机务段、铁一中等包围了，任何人都出不去，也进不来。当时王反修住在机务段，钱文俊住在铁一中，李振领住在文化宫，还有些住在自己家里，他们都被互相分割了，根本无法走到一起，也完全没有“收缴部队的首长在机务段会见了王反修、肖贻堃、李选凤、杨雨水、桂叔林、邱文润、邓承刚等派头头，动员他们交出抢去的子弹”的事。

6. 原文第二部分“事情经过”第二段第7行——8行：

“（为了对付收缴子弹）邱还提出将列车拉冷冻厂去卸的建议。王反修提出：把女同学组织起来，如果部队来包围，就由女学生出面挡住。”

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部队会单方面收缴子弹，也就不会去事先商量应对办法。此内容纯

<sup>1</sup> 王反修口述（2018年4月25日）

属编造。<sup>1</sup>

6. 原文第二部分“事情经过”第三段倒数第6—11行：

……五时左右，第二次到车站10道将9257次列车八辆援越子弹车拉入冷冻厂卸车，押运的解放军要求打收条，王反修以“李向阳”的名字打了收条。可在打收条时，查看过运单，发现是援越物资，但事后仍欺骗群众说是“进凤凰仓库”的。子弹卸下后，李振岭派人通知廖伟然，廖即派人武装接管了冷冻厂，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子弹分运市内各地。

对于本段中“在打收条时，查看过运单，发现是援越物资，但事后仍欺骗群众说是进凤凰仓库的”的说法，当事者王反修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单，也不可能注明是援越物质，军运怎么可能不保密？”<sup>2</sup>

至于“廖（伟然）即派人武装接管了冷冻厂，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子弹分运市内各地”，冷冻厂一直是“422”住在那里（正因为如此，柳铁工机联才敢于把子弹拉到那里），怎么会出来一个“廖即派人武装接管了冷冻厂”的事呢？编造者在这里太不要事实，太不要逻辑了。

总之，“5.21”、“5.25”是两起重大事件，但是只是在特定环境下，随机临时发生的事，事先完全未有策划。而经过一系列精心编造，变成了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事件，这是文革中广西大量冤案产生的原因之一。《大事件》未经甄别，采用了这些假材料，是不慎重的。■

<sup>1</sup> 王反修口述（2018年3月14日）

<sup>2</sup> 王反修访谈，2018年3月14日，并参见黄玉梅《追求与命运——造反派自述》第47页，第二段。

## 【书评】

## 高屋建瓴的五个问题

## ——《平定县里不平定》前言读后

石名岗

《平定县里不平定》作为县文革史，它不但抢占了国内县文革史的第一，而且高屋建瓴地抢占了论述的高地。其前言尖锐地提出的五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这五个问题是：

- 1、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他是否有一个总体的策略、规划？
- 2、红卫兵是怎样被发动起来的？他们为什么如此听话？
- 3、文革为什么会有两派之斗？这种派别之争有什么意义？
- 4、文革为什么会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
- 5、为什么说了解文革、研究文革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有不少启发？

这五个问题概括了整个文革。如果文革是全息的，那么局部的文革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文革不是全息的，只有从总体的高度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许多上层的操作未涉及到下层，文革的信息至少不是完全全息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但要基本了解文革的全貌，还应该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下面对这五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果你是“英雄决定历史”的主观决定论者，大致会认为是权力斗争引起毛泽东发起文革；如果你是“群众决定历史”客观论者，大致会认为是客观条件引起文革，毛泽东只不过点燃了炮捻。或许还有主、客观综合论者。

同样，主观论者可能认为毛泽东有总的策略、规划，客观论者认为不存在所谓总体策略、规划。不过，从文革的实践看，即使有总体的策略、规划，也与实际进程相距甚远。

第二个问题，过来人应该问问自己。

请问：您当年是怎样被发动起来的，为何那么听话？或者您当年为什么没有被发动起来，为何那么不听话？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如果您没有经历过红卫兵年代，应该这样分析：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各有发动的原因，各有自己的目标，各有自己听不听话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应该听毛泽东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说：“除了沙漠.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 都有左中右. 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好像他老人家还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法国大革命中有雅各宾派和吉隆特派，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工党中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是代表自己及自己阶层思想和利益的集团。似乎有了派，有了不同意见，社会才能进步，大概这就是派的作用。当然，只有有了民主，派才能正常发挥作用。

第四个问题，暴力是革命的伙伴。

迄今发生过的一切大革命，无不伴随着暴力。如果把文革的暴力分类的话，可分三类。

一是下层斗上层。如批斗走资派，这也是上层鼓动的。这种暴力是较轻的，山西有一位企业家说过：“文革是暴力革命中最和平的革命，又是和平革命中最暴力的革命。”这种说法似乎有一些道理。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留下了路易十六全家、许多贵族及自己的头颅；俄国革命的利斧砍下了沙皇一家、贵族、社会革命党人、许多资产阶级及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头颅；而文革没有枪毙一个走资派，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后来还被重用。说明文革对他的对象相对来说还是温和的。

二是上层斗下层。文革中出现的屠杀群众的残酷事件，如大兴、如道县、如广西，还真不一定是中央文革那一伙人干的，多为“走资派”对“民主”革命时期对象进行继续“革命”，目的是为了转移目标和对文革派报复。

三是下层斗下层。如派别之间的武斗，这是基层为派别的权力或者政治利益或者其它利益的互斗，一般革命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即国内革命战争。对文革来说这是局部的。

第五个问题，文革结果：改革开放。



文革后三十年的历史表明，“走资派”还在走。这个结果说明一个事物走向极端时，必然走向反面，从1966年的“八一八”到1976年的“四五”，就是走向反面的过程。对于当时的各个阶层，其反思有共性有个性。其共性形成了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个性造成了改革的不完全和失误。这个问题值得深讨。

五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个大四阶高次方程，它没有通解（十九世纪法国数学家伽罗瓦证明了五次及以上之方程式没有公式解），但必有与阶数一样多的特解，这些解不一定是整数，但一定有实数、虚数及复数解。这些解的性质也体现了解题者的水平，不知复数是什么的人，是得不出复数解的。同样，文革之类社会问题其实也不只有一个答案，答案的水平也在于人的不同的理论水平，当然思路越开阔、理论水平越高的人，答案就越准确越完全。显然，高屋建瓴的问题，需要高屋建瓴的答案。■

【口述】

## “一步三回头”：我和朱永嘉一起去造反

余子道、苏松柏口述 樊建政整理<sup>1</sup>

时间：2012年11月23日

地点：复旦大学历史系办公室

受访人：余子道、苏松柏

主访人：樊建政

记录：录音

<sup>1</sup> 余子道，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专家，1958~1966年任复旦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苏松柏，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樊建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文革初期，1966年11月24到12月12日，这一段时日是我与朱永嘉起来造反、复旦党委被打倒（造反派称为“打杨战役”）的关键时刻。这段历史距今46年了，当时的笔记本、日记本等原始资料都散失了，大部分情况只能凭记忆，但印象实在深刻、又重复回忆过很多次，所以，基本情况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留下信史，对它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作尽可能准确的回忆。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过世了，这段历史极有可能就湮没了。

1966年10月之前，文革最初的四个月里，我一直是坚决支持复旦党委，坚决与造反派对着干的。那么，为什么11月底12月初会造反呢？回想起来，当年这个变化经受过十分痛苦的历程，是内外、远近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说起来，最早的主要因素是以下三个，是它们给我种下了起来造反的种子。

第一个因素是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林彪的国庆节讲话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讲话很明显是支持造反派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的概念，第一次权威性地正式号召“彻底批判”“资反路线”。

那个时候，“两报一刊”社论是全党、全社会，尤其是我们政工干部，观察时局动向，确定大政方针的指南，所以林彪的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大大地影响了我对文革形势的估量。对照《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方面我发觉所谓“资反路线”的种种表现，譬如定调子、划框框、围攻“少数派”、整“黑材料”等等，在复旦（包括历史系）的运动中都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我又非常不能同意这个社论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书生之见，如果在运动中贯彻这个社论，那岂不是要依照造反派的做派去搞运动？！那将导致局面失控，后果会不堪设想。我反而觉得，复旦运动的

搞法，是符合文革“十六条”和党的历来政策的，没有错。这是我第一次对《红旗》杂志社论产生抵触情绪，之前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我1958年开始任历史系总支书记，同年《红旗》杂志创刊。）

不过，在抵触之余，当时我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社论决不会是个别人随意乱发的，它是代表着中央的意图。可以说，这不能不引起我对文革形势的另一种思考（虽然我极不愿意看到如此局面）。

第二个因素是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0月5日）（简称“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贯彻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的方针，总调子是支持造反派，主要内容是：（1）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2）为“反革命”等平反、销毁整他们的材料；（3）把“坏家伙”揪出来；（4）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5）军队院校不介入地方。

10月19日，复旦党委正式开始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停止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当时，复旦政工干部的反响异常强烈，思想严重对立，大家普遍疑问：（1）怎么可以停止党委对运动的领导？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2）对应起来，“少数派”在复旦就是造反派，而造反派是反对党委的，怎么能保护“少数派”？（3）运动中所整理的关于一些学生和教职工的材料不应当被定性为“黑材料”。在运动中，摸清基层群众的政治动态、思想倾向，及其变迁，这是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并且，依据中共基层党组织历来的工作准则，不了解基层政治动态，是失职行为。所以，搜集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群众的政治动态和思想倾向，不是为了整肃群众，不能否定搜集材料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至于谁是不是“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必须要以充分、确凿的材料为依据。反过来说，难道以往我们党，为了掌握群众运动的政治动态，所搜集的材料，都成“黑材

料”了吗？尽管这样想，但我又不能不去反思复旦前一段运动的搞法与中央精神是否一致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此次中央工作会议，更进一步强调了所谓“彻底批判”“资反路线”。11月5-10日左右，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市、区（县）、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三级干部会议上，曹荻秋是主持人，作了总的传达报告（陈丕显因病未参加），复旦大学总支书记、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都到场聆听。11月10日至15日，复旦党委自行组织集体讨论的闭门会（以下简称“复旦闭门讨论会”），与会者为复旦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同志，地点在第9宿舍65号招待所。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有两项：（1）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包括《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月25日）、《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0月23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月16日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总结发言，是最系统的关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0月全国运动概况的论述）。（2）回顾和检查复旦文革运动，总结经验、教训，讨论校党委关于前一阶段运动的总结草案。

在11月10日至15日的复旦闭门讨论会中，文科各系的总支书记和来自校党委宣传部、外事办公室的中层干部，约十余人被编为一组，进行分组讨论，我发言最积极，意见也最多。特别是在最开始的一个阶段，我唱的都是反调。我发言提出，为什么我们以前的搞法都错了？为什么这样搞叫“资反路线”？为什么要支持造反派？……等等。我特意随身带来《毛泽东选集》，把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毛选”的相关论述做比照，认为中央工作会议与毛主席历来的思想都不一致。记得我公开说，中央现有做法实难接受，思想上存在“四大不通”：

（1）文革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从《红旗》国庆社论到中央工作会议文件，都展现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造反派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倾向，而且愈来愈为明显。讨论会上，我宣读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相关论述：

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明确指出“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是“缺乏清醒分析”的，是个“缺点”（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卷四，1310页）。我说，现在群众中，特别是造反派当中，存在很多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党组织应该站在群众的前面积极教育与引导，而非跟在群众后面搞“尾巴主义”，对于“造反派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倾向绝对不能容许，尤其不能持“他们无论搞什么，我们都无条件支持”的态度，否则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言外之意，批判“资反路线”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我还说，在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停止党委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依照陈伯达的讲话《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强调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们以往对待造反派的做法是错误的。我认为，群众运动当然要正确对待，但群众运动也存在正确引导的问题，造反派的某些做法在《毛泽东选集》中找不到任何根据。我们抵制造反派的错误，不应当被看成是不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当时我说，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曾出现过许多“大轰大嗡”、扩大打击面、过火斗争干部的做法，但中央发布了“二十三条”，错误很快就被纠正了。相比之下，文革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严重的多，中央到底为什么要放任？为什么不纠正？

（3）干部政策问题。毛泽东从来都讲，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绝对没有讲过要“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更何况，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十六

条”，无不肯定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句话，到处游斗干部的做法，严重违背了党的一贯政策，大大过火了，而且简单、粗暴。

（4）“资反路线”问题。上海、复旦到底有没有“资反路线”？我认为确实存在，如打击造反派的情况，但问题并不严重、程度也比较轻。这个看法和曹荻秋在上海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曹荻秋讲话的大体意思是（我对曹荻秋讲话作了简要记录），上海文革运动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贯彻了“资反路线”，但程度比较轻、问题并不严重。我还说，就复旦文革而言，政工干部仅是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主要责任应该由中央负），我们应该向群众检讨，我们只要愿意改正，就应该“一风吹”。

我的这些发言，激起了绝大多数政工干部的共鸣。我被打倒后，这些发言被造反派说成是攻击中央文革，他们逼我交代，我只好比照“二月逆流”中谭震林的谈话，自我检讨，说我发言的调子和谭震林一模一样，说谭震林放的毒我的发言中都有，说自己是“谭震林的跟屁虫、孝子贤孙”。

听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复旦党委的中层干部普遍情绪低落，思想迷茫，普遍感觉既不被造反派所容，又不为中央所满意，已处于上下夹攻、进退维谷的境遇。中层干部的这种情绪甚至弥漫到复旦党委校级领导干部层。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不堪心理重负，提前住进华东医院，试图躲避复旦闭门讨论会。王零是校领导，不参加不行，后来还是勉强出席了。（当时，他身体确实不好，但尚未严重到住院治疗的程度，应该说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给他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他住院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复旦闭门讨论中，校党委几位书记，诸如王零、郑子文、徐常太、葛林槐，大都闷不做声，甚至出现意见分歧。

按照预定计划，复旦闭门学习会后，校党委要拟定一份关于复旦文革运动的书面总结。按要求，这份材料是公开性质的，要上报上海市委，又下达全校师生员工。这个书面总结，事先已由党办副主任季宝卿等草拟，拿到闭门会上来讨论的目的是征询

意见，以便最终定稿。这个书面报告兹事体大，涉及对前一段文革运动的评估，特别是复旦党委及其下属组织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严重程度及责任认定等问题。这份草稿引起了激烈争论，甚或相互埋怨。葛林槐当着王零的面，说《红缨枪》由王零直接领导、指挥，其写作骨干都由王零钦点，他们的档案和政治状况王零亲自考察，结果谭启泰、欧阳靖二人叛变了，谭、欧阳把党委的内幕都抖了出来，他质问王零对此有没有责任？一句话，总结报告，非常难以既兼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又让政工干部们满意。这个时候，造反派在校内外连连制造事端，闭门会被迫中断，书面总结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入党以来，尤其是担任政工干部以来，我对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一贯是深信不疑、坚决贯彻的。因为总是相信中央是正确的，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尤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我就不能不十分严肃地考虑以下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如此抵触？到底是中央错了，还是自己错了？于是乎，怀疑产生了，反思开始了，思想上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彷徨，政治上也开始徘徊在十字路口。当我无可奈何地一步步后退，承认有“资反路线”错误，逐步接近中央的精神的时候，也就为起来造反筑起了一个台阶。或者说，截止朱永嘉回到上海，我仍然和造反派对着干，依然坚持所谓“资反路线”，但是在非常抵触之下、非常无可奈何之下、非常痛苦之下，已在考虑与中央保持一致、服从和执行中央指示的问题了。

正当我徘徊在十字路口、举棋不定之时，朱永嘉和“罗思鼎”小组造反了。

朱永嘉在上海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当时正念中学。1950年，朱永嘉考入复旦历史系，以后留校工作。在复旦当学生时，我在校团委工作，他在校学生会工作，彼此就熟悉了。1956年，我调入历史系工作，与他在一个党支部。后来，我担任系党总支书记，他是总支统战委员，我们有工作关系，而且私人关系也一直很好。

“罗思鼎”小组成立于复旦历史系，起初是个理论性、学术性的写作小组。它是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队伍的号召而产生的。1963年10月，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篇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笔精心修改，提出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建设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队伍，它吹响了学术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号角和动员令。学部会议精神传达后，1963年冬，朱永嘉同我商议，在系里组织一个理论写作小组，参加学术界的战斗，成员以党员青年教师为主。

这个小组由朱永嘉牵头，最初叫历史系写作小组，初始成员还有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的吴瑞武、王知常，这两人都是青年党员教师。最初并无朱维铮加入，当时朱维铮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青年教师，非中共党员，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系里部分同志对他有异议。让朱维铮参加写作小组，是我的主意。我认为，朱维铮在思想作风上有些毛病，但这是可以教育改造的。他的学问很好，文字能力也很强，又勤奋努力，应当予以着重培养。这样以来，朱永嘉同意了我的意见，把朱维铮吸收进了写作小组。

起初，他们只在系里活动，边教学，边搞理论写作。他们发表文章时，正当全国学雷锋之时，就用“罗思鼎”为笔名，寓意“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创办内刊《未定稿》，在丁香花园设编辑部，由市委书记石西民直接领导，下设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任务为批修、批资，就重大理论问题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以及参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哲学组由原复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郭仁杰负责；文艺组由市委宣传部徐景贤负责，历史组由复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历史系教师金冲及兼任组长。“罗斯鼎”小组经校党委和市委教卫部门同意，成为内刊编辑部的历史组人员。1965年秋，石西民奉调北京文化部，金冲及、郝孚逸、雷仲平、沈竹随调。此后，朱永嘉继任历史组组长职务，历史组、文艺组及哲学组统称市委写作组，归辖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



“罗思鼎”成为内刊历史组的班底以后，工作地点从系里转移到了市委机关，但所有组织人事关系仍在复旦，朱仍然是历史系总支委员，家也在复旦第六宿舍，与我家隔窗相望。文革开始以后，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组长、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之一。他从市里回来，都会和我聊天通气，谈谈上海、复旦运动的情况，包括上海市委领导人的一些内部讲话。我们对运动的看法基本一致，都坚决支持市委和复旦党委，抵制造反派。那个时候，我看不出他对上海市委领导文革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应该还没有造反的念头。

1966年9月下旬，朱永嘉奉上海市委之命，以《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身份，赴京了解中央、北京文革动态。这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要探听中央信息，以便应对、准确决策。国庆节前夕，朱永嘉突然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复旦第六宿舍门房，指名道姓要找我（注释一）。电话中，他说的不多，但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我改变方向、支持“少数派”。“少数派”在当时指的是造反派。接完电话，我不以为然，反而很诧异他老朱怎么要我支持造反派？！可以说，我压根儿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电话的来头和分量，以为是他个人的看法。在随后的某次总支委员会会议上，我把朱的来电告诉了与会同志，征询大家的看法，结果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应。直到年底，我们造反了，我才恍然大悟，他的这个电话是给我打招呼的，实际上是对我的政治关心和提醒，是希望我免于被动。后来我也了解到，朱到北京后接触过姚文元，从姚处得到了高层支持“少数派”的政治风向。在上述电话之后，直到11月24日朱永嘉回上海，我们再没有任何接触。

11月24日晨八点钟左右，我照常去复旦200号历史系党总支办公室（现文博系底层东南角房间）上班（这个时候，党总支已经停止了对运动的领导，但组织生活还是要过，办公室我们还得去），发现在100号和200号之间（位于登辉堂前大草坪旁）的马路上铺了一条直幅大标语，上面写着“勒令历史系党总支立即通知朱永嘉回校参加运动，接受群众审查”。这副大标语长近百公尺，用大张白纸写成，落款是历史系

前卫兵团（前卫兵团属于造反派）。11月份，全国运动的大形势更加有利于造反派，16、19两日造反派连续冲击历史系党总支，特别是19日还发生肢体冲突。所以，看到标语，我丝毫不敢懈怠，我敏感地意识到造反派要揪朱永嘉了。此时，朱是市文革小组成员，正由市委派驻北京，历史系总支无权决定他是否回校参加运动。于是，我叫党总支办公室值班员、总支委员何凤瑶，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兼教卫部文革办公室主任倪斯美，说复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余子道报告市委：现在系里造反派强烈要求朱永嘉回复旦参加运动，请市委决定如何处置。倪斯美答复，他会立即报告上海市委。

11月24日下午，朱永嘉回到上海，他因为摸不清情况，并未同我见面。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系保守派却抢在造反派之前，突然发起了对朱永嘉的批斗。25日上午，大队部红卫兵第三中队、系文革以及“乘风破浪”战斗小组集中主要力量，积极筹划发言稿和发言人等批斗事宜，并于25日下午、26日上午、下午（连续三个半天）在数学系梯形教室，集中批判朱永嘉。保守派的批判重点是投降主义的统战路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并且联系朱的家庭出身，以及他和系里陈守实、谭其骧的关系等等，指责朱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的徒子徒孙，还说他是老右倾等等。保守派强调说朱永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灵魂要好好改造，提出他这样的人不合适在市委写作班搞理论工作。面对批判，朱永嘉作笼统表态，称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很严重，资产阶级世界观要好好改造，丑恶的灵魂确实要好好洗洗。

这几天的批朱会，我都在场，整个过程我作了详细记录。我发觉，起核心作用的是李华兴、吴维国。这时候，我担心他们头脑发热，把问题搞成敌我矛盾，把朱打成“牛鬼蛇神”，但苦于党总支已停止对运动的领导，我已很难以党组织身份出面讲话。在那种形势下，我也不便于去找李华兴、吴维国，私下接触他们。正在这为难的当口，李华兴主动来找我了。26日天黑后，我正在第六宿舍楼下（家门口）散步，李华兴行色匆匆，独自来了。李华兴和我私人关系很好，是“乘风破浪”战斗小组的骨干。

他告诉我，这三天的批朱行动是由他、吴维国、韩国劲三个人策划的，所有发言稿他也一一看过。特别是，他亮给我底牌，说“我们会适可而止，只要老朱态度比较好、大体承认错误，我们就会收场，不会把他当作‘牛鬼蛇神’打倒。但是，如果老朱公开对着干，就比较难办了。”我答复说，如果有机会，我会把他的意思转达朱永嘉。

通过一夜的思考，27日清晨，我写了张纸条，说“上午十点钟四平路和平公园东大门口等”，叫盛善珠趁天蒙蒙亮，悄悄从朱家的窗户递给朱的夫人。27日上午10时前，我来到和平公园，不久朱也到了。我把李华兴的话转告朱永嘉，朱把在学生宿舍遭质问、被批判的情况讲给我听。他说，保守派和造反派都不会放过他，自己已经陷入死局，自己很忧郁。约见他，给他通气交底，除了让他不要跟保守派硬顶之外，我还有特别的意图，就是提醒他千万不能向造反派交代在北京工作的情况，希望他既不要跟造反派当面顶牛、更不能向造反派投降。约见结束，朱永嘉把在北京活动时使用的《文汇报》记者证交给了我，他还庆幸记者证前一晚没被造反派搞去。回家路上，走到国权路、四平路交叉口的一个小胡同里，我把这张记者证扔进了一堆污泥里，以免带回家被造反派抄去，造成麻烦。27日的这次密谈中，朱永嘉讲话很少，思想极度矛盾。

从27日下午到28日傍晚，短短的一天半时间，是朱永嘉下决心造反的最最关键时刻。这段时间里，朱永嘉到底和造反派是否接触过？我不掌握直接信息。我猜测，27日同我见面的时候，朱永嘉也许已经有造反念头了，只是犹豫不决、尚未最终做出决定；也许他还在考虑策略问题，走一步看一步，只是尚未在言语上表露出造反的意向，只是不便对我明说。但是，他的造反声明在发表前给郭仁杰看过，凭这一点，我判断他肯定和造反派有过接触，并且达成了某种协议。

朱永嘉的大字报《我要造反》，大约在28日傍晚四、五点左右贴出，具体位置是中央饭厅门口的大字报栏。这天晚上，大队部红卫兵在中央饭厅（位于学生宿舍区，现复旦旦苑餐厅的位置），召开全校性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傍晚大约五点多一

点，我陪王零、徐常太等参加大会，走到饭厅门口时，只见朱的大字报墨迹欲滴、浆糊还没干。同时，我还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郭仁杰的大字报《历史系总支为什么现在抛出朱永嘉》。看到朱的造反声明，听到郭仁杰的大字报，我感觉朱永嘉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他公开宣布造反了。这个时候，大会马上就要开始，我已来不及思考更多。

11月28日晚的保守派批判朱永嘉大会，这是复旦造反派和保守派相互较劲的结果。经过三次大会，保守派的批判即将收场。但是，保守派抢先批判朱永嘉，这打乱了造反派的原定计划，也就是说，造反派没有预料到“成熟的桃子”竟然被别人先摘了。前卫兵团怀疑保守派批朱永嘉，是余子道在策划、搞阴谋诡计。于是，在26日下午保守派批判朱永嘉会议快结束时，前卫兵团派人冲了会场，把朱永嘉抓到了历史系学生宿舍。在那里，朱永嘉遭遇很多造反派同学的质问，上海师范学院教师、复旦校友兵团头头王春瑜（复旦历史系毕业生、朱永嘉的学生）还威胁朱永嘉说，“你不要‘死猪不怕热水烫’”，言外之意，朱永嘉若不老实交代，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动作。26日傍晚，朱被放回家过夜，被责令限期交代。我住二楼，这一切我从自家窗户看的清清楚楚。

27日，保守派和造反派暂时休战（实际上双方从未真正停止过较劲和争斗），为进一步的较量，加紧做准备。历史系保守派（系文革、“乘风破浪”战斗组、大队部红卫兵第三中队等）加紧“串联”，准备乘胜追击，继续抢在造反派之前批判朱永嘉，谋划由红卫兵复旦大队部出面，调动全校保守派力量批判朱永嘉，地点也挪到中央饭厅，并且要求复旦党委所有领导都参加。这样以来，批判大会的规模、层级，不再是原来的历史系了，升级扩大成了复旦全校性的；而历史系造反派一面加紧策反朱永嘉，给他分析形势，宣读毛著《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面则鼓动历史系师生印刷传单、抄写大字报，加紧舆论造势。

28日晚，我们历史系党总支委员被指令全部到会，我得以目睹现场。会议尽管由保守派主办，但造反派老早做好了充分准备，调动了全校力量来冲场。实际上，“罗思鼎”也早早回校，集体到会了。晚间近七点钟，会议开始，上半段由保守派主导。李华兴做主要发言，但基调突然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一般地批朱永嘉的资产阶级作风、投降主义等错误，而主要批判“罗思鼎”小组的方向性错误。他指责“罗思鼎”贯彻、执行了“二月提纲”的错误路线，抖出了一系列“罗思鼎”遵照“二月提纲”调子写的文章，还说“要追根子”。这是会议的转折点。

在文革爆发前后的一个时段，“罗思鼎”确实按“二月提纲”的精神发表过文章。不过，谁都知道，“二月提纲”是以中央的名义下达的，上海市委只有贯彻、执行的问题。至于“追根子”是否含有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的意图？李华兴后来告诉我（详见后文，李华兴在文革后和我的深夜谈话），28日晚他并无此意，当时他尚未发现“罗思鼎”那些贯彻“二月提纲”的文章与张、姚有什么直接关联。一句话，在28日晚的大会上，李华兴要追的所谓“根子”是“二月提纲”，而决非《前卫战报》所说的“中央文革”。我估计，李华兴选择如此策略，是既想批朱永嘉，又不想牵连上海市委。

可是，李华兴的“追根子”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尤其容易使人联想到“‘罗思鼎’的背景到底是谁？”李华兴话音刚落，朱维铮就从观众席上站了起来，他手指李华兴，直直追问“追根子？你追好了。你知道根子是谁？”“在哪一级，就追到哪一级，绝不手软！”李华兴的这个回应，没有直接以“《二月提纲》”作答，反而大有弯弯绕、故弄玄虚的味道，这给“罗思鼎”提供了绝佳的反击机会。李华兴话音未落，王知常、朱维铮又站起来，公开进行反击。朱维铮针锋相对，指着李华兴，直言“根子就是张春桥、姚文元。”显而易见，“罗思鼎”巧妙地抓住了“追根子”的含糊处，对它做了不同于李华兴本意的、纯粹逻辑式的推论和解释。

当时中央文革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就等于在政治上被判死刑。戳到中央文革，这让保守派极其被动、极为不利。随后，造反派一哄而起，会场一片混乱。

大会上，造反派还揪住王零，要他交代“活跃分子”和“黑材料”问题，但王零吱吱唔唔说不知道。造反派还盯上了我，大喊大叫，要我交代“活跃分子”问题，我表示听说过“活跃分子”的说法，说这种提法是从造反派的大字报中看到的，说我自己理解的所谓“活跃分子”就是思想比较活跃但尚未定性的分子。我如此回答，是想掩护校党委，想把“活跃分子”问题与校党委切割开来。造反派听了大为不满，“红革会”头头赵基会马上站起来，喊口号“余子道顽固透顶，还不老实交代。”我站起来想解释，当即被造反派一片口号声压了下去，十分狼狈。造反派轰我的情景，朱维铮不以为然，他马上站起来大声呼喊，要求造反派安静点，“给余子道同志讲话的机会，让他解释。”朱维铮这一行动，实质上是想保护我，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睬，继续呼口号轰我，我也就以不做声相对抗。

此后的大会，完全沦为两派红卫兵的激烈辩论会（没有武斗）。保守派红卫兵、历史系学生刘根良抢夺麦克风，指责造反派无理取闹，捣乱会场；造反派红卫兵则斥保守派对“资反路线”“假批判、真包庇”。最后，赵基会勒令余子道、王零、郑子文、徐常太等退场反省。

大队部红卫兵召开的这次大会实际上并未开完，被造反派中途冲垮了。

11月29日到12月2日，是以我为首的历史系党总支主要干部造反的关键时刻，朱永嘉对我的直接劝说和引导是关键因素

29日晨大约六点多，天还没全亮，我尚未起床，朱永嘉夫人匆匆到我家，找我夫人盛善珠，传朱永嘉的话“老朱希望余书记赶紧起来造反，否则就被动了。”我淡淡地表示知道了（未表态是否要造反）。此前此后，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始终在权

衡造反的利弊得失。我认为，自己已经处在十分被动、非常危急的境地了。虽然历史系保守派会站在我一边、继续保护我，但要继续挡住造反派的攻势估计已不大可能。如果不造反，肯定会被打倒，宣布造反则可能不会马上被打倒。有了如此的想法，事实上就为我和造反派妥协打开了思想上的缺口。

上午大约9点钟左右，王知常、吴瑞武委托朱维铮（朱维铮不是党员）到我家，动员我造反。朱维铮代表“罗斯鼎”小组说，老余一直是个好干部，现在犯了一些“资反路线”的错误，只要转变过来，仍是一个好干部，是不会被打倒的。他还说，我们“罗思鼎”全力支持老余造反，我们一定与你共同战斗。在与朱维铮的谈话中，我明确表态：（1）造“资反路线”的反，我可以接受，但要打倒复旦党委，我无法接受。（2）杨西光有缺、点错误，我可以揭发、批评，但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不能接受。即使我出来揭发、批判，也不会讲“打倒杨西光”、“杨西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类的话。如果造反派逼我上这个纲，我不能同意。朱维铮当场表示，对于杨西光是否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问题，你可以不表态，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不一定按照造反派的调子去表态，可以不去理会造反派是怎么批杨西光的，可以只批“资反路线”（“资反路线”仅仅指文革运动中压制群众造反等问题，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涉及文革前建国十七年的整个路线问题）。我这种态度，可以得到“罗思鼎”小组的谅解和认同，但要在造反派那里根本行不通。造反派奉行“打到一切”，后来他们就说我是假造反。

29日下午，朱永嘉亲自来我家。他对我说，“资反路线”属全国全党性问题，所有大学基本都贯彻执行了，主要责任不在基层而在中央。政工干部只是政策执行者、贯彻者，更不应该被当作“罪魁祸首”，加以整肃、批斗。但由于长期处于和造反派对着干的第一线，政工干部首当其冲，现已陷于极其危急的境地。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这是政工干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他跟我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唯一可行的出路只有一条，即：调整策略，暂时转换立场，宣布造反，主动批判“资反路

线”，以改变被动局面。如果不反戈一击，起来造反，必然面临被打倒的危险。他问我，他夫人、朱维铮都来过了，我考虑的怎样了？他的意图很明确，是希望我举起造反旗帜，发挥表率、带头作用，带动复旦广大中层干部转变立场，免遭被打倒的厄运，换得从长计议之机会。简言之，他的想法是：先起来造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至于以后怎么办，视情况再做打算。他还说他正在做蔡祖泉同志的工作，推动他反戈一击，带动党员干部摆脱困境。朱的这番话是真心话。我对他重申了此前对朱维铮所讲的意见，朱永嘉表示愿意跟造反派去沟通，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当时，朱永嘉比较乐观，认为造反派对他的意见还是比较尊重的，说他基本可以控制复旦的局势。

正当我思想斗争激烈之时，29日当晚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经过一整天的谋划，29日当晚，六位指导员在生物系一个礼堂召开了“控诉复旦党委和历史系总支扼杀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大会”。原来，28日中央饭厅批朱大会被冲掉，历史系六位指导员邹万春、汪瑞祥、刘其奎、鲍怀崇、李华兴、吴维国并不甘心，他们决定继续批朱永嘉，批“罗思鼎”，反击造反派。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批判总支和党委的“资反路线”错误，但批系总支是虚的，批朱永嘉、批“罗思鼎”才是实，用当时造反派的话说，就是“反攻倒算、假批判、真包庇”。这个会议名义上是要批判我，按汪瑞祥通知，我去参加了。他们发了一些言后，就着重去揭朱永嘉的老底了。会到中途，造反派又冲了进来，两派又一次面对面激烈交锋。

凌晨过后，约一时半，“罗思鼎”成员吴瑞武在造反派的保护之下走进会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枪口要一致，要联合起来揭发“资反路线”，批判复旦“走资派”。接着，汪郑重其事地宣读了姚文元11月29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指示：

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很惊讶，关锋、戚本禹同志听了很气愤。



（一）去年十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罗思鼎小组的方向是正确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二）追根问题，话要讲得硬，根子就是姚文元、张春桥，现在来搞罗思鼎小组是转移目标，希望左派不要上当，应当搞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朱永嘉的错误主要是六三年以前，八届十中全会以前。看人主要看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这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第三回合较量。姚文元电话指示，犹如尚方宝剑，彻底给保守派判了政治死刑。

30日，我下了起来造反的决心。上午，朱永嘉又到我家，他告诉我造反派欢迎我们造反，希望我赶紧发表造反声明，否则就太晚了。随后，我就和盛善珠两个人开始商议最终的决定，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以历史系党总支名义宣布造反，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宣布造反。可是，我们又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的话，人数太少，孤掌难鸣，不具有代表性，最好还有其他人参加。于是乎，下午，我派盛善珠把苏松柏和何凤瑶请到我家来商议。本来还想再多联系些人，但问题高度敏感，太尖锐了；加之老苏建议尽量不要再找其他人，以免节外生枝，所以最终确定的参加者只有余子道、苏松柏、何凤瑶三个人。我们三个人还共同商定，于12月1日发表造反声明。可是，30日晚前卫兵团的头头徐彪就到我家来，探察我造反的虚实，拿走了由我执笔的造反声明草稿《造‘资反路线’的反》。这样以来，我们的造反声明在第二天，31日早晨就广播了，广播里的署名只有余子道一个人，而苏松柏等人的名字未出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造反声明草稿被徐彪拿走时，苏松柏、何凤瑶还未及签名。这就是造反派所谓的30日晚余子道家小型交锋会。

11月30日晚，徐彪拿走我的造反声明，我要造反已成定局。但心底里，我依旧是一万个不情不愿，我依然在观察，在考虑其它出路。

11月31日，我和盛善珠去串联中文系党总书记、副系主任、老党员杜月邨，征询他对于我造反的意见。他和我个人关系很密切，与我们政治态度相似。我和杜正在谈话，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党员、青年教师陆士清敲门进来了。陆士清说，他们准备成立第四司令部，继续与“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对着干。陆士清等不同意“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的观点与做法，认为：（1）大队部红卫兵已危在旦夕，大队部的旗帜不能继续打下去了，必须竖起另外的属于自己的旗帜，以吸纳原大队部红卫兵和政工干部；（2）批判“资反路线”，要严格遵照党的干部政策，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决不能步造反派冲冲杀杀、“打倒一切”之后尘。他们已联络了徐景西（中文系青年教师、党员）、姚长胜（中文系学生党员、大队部红卫兵，后参加大队部造反派红卫兵）等一批人。听到陆的这般设想，我当即就表示很愿意参加。历史一旦追究细节，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人的思想变化往往是复杂的。后来造反派批判我说，“余子道造反摇摇摆摆、三心两意，是假造反”，这应该是说对了。第四司令部以陆士清、徐景西、姚长胜等为发起人，主要成员是坚决反对造反派、且不易被造反派打倒的党团员。除了我、盛善珠、杜月邨，他们还联络到了中文系党总支部书记张君炎、外文系党总支部书记袁晚禾等中层干部。

12月1日上午，第四司令部开始筹备。1日下午两三点左右，陆士清、姚长胜、徐景西通知我和盛善珠，从家里转移到第九宿舍65号复旦招待所。到招待所不久，陆士清又通知我、盛善珠、杜月邨、张君炎等人一起到校外一个僻静地方，去讨论第四司令部成立宣言等具体事宜，去起草我们揭发、批判党委贯彻“资反路线”错误的发言稿。按照陆士清的安排，我们的原定计划是，当晚住在宝山县罗店，商量好相关事宜，第二天再返校发表宣言，成立第四司令部。晚10点钟左右，正当我们在房间里讨论我的揭批“资反路线”的发言稿时，徐景西、姚长胜两人从复旦赶来了，他们告诉我们：红卫兵大队部基本垮台，另树旗帜、重拉队伍已无可能，成立第四司令部的计划只好终止。此时已近深夜，罗店镇黑灯瞎火，没有出租车，我们步行到一两公

里外的长浜车站，总算等到了到市区的公共汽车，此后大家分散回校。我与盛善珠到外滩后，回复旦的交通已断，只好转公交车到杨树浦，幸好找到了一辆三轮车，才折回复旦招待所。

对于筹备第四司令部的事情，我们严格对外保密。我离家时，特意嘱咐保姆：“有人问余子道去哪里了，你一概回答不知道”。所以12月1日整个下午，外面传说我们神秘失踪了，造反派找不到我了。造反派原本要我在12月1日批判复旦党委的“资反路线”大会上发言的计划，也泡了汤，前卫兵团和“罗思鼎”小组感觉很被动，担心“打杨战役”受到影响。前卫兵团、“罗思鼎”小组等焦急地团团转，到处找我。朱永嘉还带着前卫兵团的红卫兵，到江苏路盛善珠娘家搜查，甚至告诫她母亲不要包庇余子道。

1966年12月2、3、5日，复旦造反派连续集会，“重炮猛轰”杨西光和复旦党委，造反派称之为“打杨战役”。

12月2日，我一个人隐蔽复旦招待所，心情非常紧张。临近中午时，高音喇叭里清清楚楚地传来“重炮猛轰复旦保皇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现场广播（苏松柏：当天会场人山人海），苏松柏、蔡祖泉两人的造反声明，以及大队部垮台的通告，我都听到了。当时我分析，也许朱永嘉对于我的这次中途出走，不会特别计较，觉得造反这条路可以再试试。我叫盛善珠打电话给朱永嘉，告知他我已回校，并要朱向前卫兵团说明情况，随后我撤回自己家里。我的造反事宜，是朱永嘉委派吴瑞武具体处理的。吴瑞武先来我家跟我商量，后到学生宿舍六号楼接洽前卫兵团。吴瑞武对我说，老余回来很好，他很欢迎，我也表示愿意继续照以前达成的造反协议往下走。2日下午一点左右，吴瑞武和前卫兵团的徐民权等五个造反派红卫兵，把我从家里带到了复旦学生宿舍10号楼。这里是造反派的“大本营”，门口好几个造反派红卫兵站岗，一个人对我喊“欢迎余子道造反”，另一个人对我喊“欢迎真造反，反对假造反”。我被关在三层的一个房间里，地上铺着草席，同屋还有原复旦党委副书记邹剑秋，楼

上楼下还关押了很多学校党政干部。随后，徐彪来找我，要求我在3日召开的批判杨西光和复旦党委的大会上发言，我只好同意，把原来的稿子加以修改，交给了他。至此，我落到了造反派手里。

12月3日大会是复旦造反派联合发动的，是所谓“打杨战役”中的关键性一仗，在登辉堂举行。全校的中层以上政工干部都被押到后台陪斗。在登辉堂后台，我接触到了安文江、赵基会、马学鸿、朱永嘉、王知常等。当时王知常比朱永嘉要激进一些。我把发言稿的大体内容告诉了朱永嘉，对他重申了我对杨西光的看法、以及我揭批的内容只限于“资反路线”。对我的发言稿，朱永嘉表示理解与肯定。他怕我背思想包袱，还跟我重复了此前他所说的话：“现在复旦局势，我能控制得住，造反派不会把你怎么样，你可放心。你这个标杆树起来，可以带动一大批政工干部，从而避免大家都被打倒。我们现在要尽力帮助中层干部解脱出来。”朱永嘉有中央文革的后台，当时我估计造反派会比较尊重他，朱永嘉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得住局势。但是，实际事态之变化，超乎想象，并非朱永嘉的实力所能及，这是始料所不及的。这次大会聂元梓到场发言，她危言耸听，极力煽动打倒复旦党委，说什么复旦党委是个顽固堡垒，现在要彻底砸烂，还警告复旦政工干部不要执迷不悟，要赶紧反戈一击，否则将与保皇党委同归于尽。

12月3日的大会基本上把杨西光和复旦党委打倒了。

12月5日“打杨战役”取得胜利，校党委垮台，复旦成了所谓上海文革“第一块解放区”。对于已经宣布造反的干部，造反派认为要区别对待，要视其具体情况而恢复其自由。鉴于余子道已经声明造反，造反派就放我回了家。6、7、8、9日四天，我一直呆在家里，静观造反派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没有再和造反派联系。

“胜利”让复旦造反派深受鼓舞，与此同时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此后，他们脑袋极度发热，无所顾忌，要“打倒一切”。复旦前卫兵团的一批“老造反”开始不再买朱永嘉的帐，不再满意朱永嘉关于运动的思路，也不再接受朱永嘉关于争取中层干

部的意见。前卫兵团的头头们，认为我的造反绝对缺乏诚意，认为我的揭发价值不大，没有触及复旦党委的核心内幕，认定我是假造反。这段时间，朱永嘉还在复旦，仍然参与历史系和全校的运动，他知道造反派正在策划彻底打倒余子道和许多中层干部的行动，可以说一场席卷全校的横扫干部的大火马上就要烧起来了，连他也无力去阻挡了。

大约12月10前，朱永嘉直接给我打招呼说，“我们后院起火了，我们要有思想准备，我的错误我承担，你的错误你承担。”显然朱永嘉已经无法控制局势了。接下来的12、13两日，历史系造反派召开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余子道大会，我被彻底打倒。我被编入系里的“牛鬼蛇神”队伍，成为了群众专政的对象，这离开我宣布造反只不过短短的11天时间。

关于朱永嘉和我的造反，这里我想再集中说说我的看法。

（一）朱永嘉造反，归根到底，是当时全国运动大趋势和复旦小环境交互促使的结果，是被逼上梁山的。1966年10月份以后，就全国而言，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造反派日益得势，而保守派每况愈下；就复旦而言，复旦党委和历史系党总支已经摇摇欲坠；就朱永嘉自己而言，他处于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夹攻之中；就造反派而言，他们“由攻到拉”，欢迎朱永嘉造反，这相对比较策略。朱永嘉要摆脱眼前困境，只有造反一条路可以选择。

（二）朱永嘉回上海之前，复旦造反派是否已有“打杨战役”的预谋？谁参与了这个预谋？为什么决定拿历史系总支开刀，作为打开“打杨战役”的突破口？为什么在11月下旬前卫兵团突然掉转矛头，暂时放开他们一直攻击的对象余子道，转向揪朱永嘉？

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掌握确凿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个中奥妙，但是我怀疑这里面有策划。我判断“打杨战役”在朱永嘉回沪之前已经有了预谋，从历史系打开缺口的策略也已经确定了，炮轰朱永嘉只不过是“打杨战役”的第一仗。“打杨战役”的主

要策划者，最有可能的是郭仁杰，而非朱永嘉。郭仁杰是市委写作班中最早、最积极参与造反派活动的人。参与策划的可能还有前卫兵团的头头徐彪一类小青年我估计。

我的理由如下：（1）他们认定朱永嘉是历史系党总支最薄弱、最容易攻下来的人，比攻倒余子道要容易得多。余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思想作风，基本找不出什么大的问题，出格言论也很少，把我打成“三反分子”缺乏足够的材料，并且攻了好几次都没能攻下来。可是，朱永嘉属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学术权威”的“徒子徒孙”，朱的思想一贯右倾、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讲话随便，好抓的辫子很多。他又长期搞统战工作，容易被戴投降主义的帽子。（2）攻下朱永嘉，追上去就是杨西光，进而还可以指向上海市委。造反派判断市委写作班有一段时间是杨西光领导的，从朱的口里可以撬出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内幕材料，从而顺利“打杨”。余子道和杨西光两者之间不过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即便打倒了余子道，对于“倒杨”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作用。（3）前卫兵团尽管只有40多号人，但心比较齐，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和担当打开历史系缺口的主力。

（三）文革结束后，曾流传两种说法：一种说复旦党委暗底下示意炮轰朱永嘉以转移目标；另一种说历史系党总支“弃卒保帅”，抛朱永嘉作挡箭牌。文革结束后，复旦党委所做的运动清查结论，就持第一种观点。我是这件事的亲历者和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两种说法均不符合事实。

（1）1966年11月下旬，要求朱永嘉回复旦的，除前卫兵团外，再无任何其它组织或个人。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于群众强烈要求党的基层干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的，党的基层组织不可以横加阻拦，而应当立即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炮打朱永嘉，完全起因于前卫兵团的通令。历史系党总支将造反派这一通令上报市委的做法，完全是迫于运动形势，不得已而为之。

（2）复旦党委从来没有示意我抛出朱永嘉。如果有这样的打算或意图，我作为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不应该不知晓。校党委领导王零、郑子文、徐常太等同志，与我密

切联系，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作过类似的示意。我也从未向系总支任何一个干部表示过这样的想法，更不要说去布置、发动这样的斗争了。

（3）朱永嘉在历史系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党总支委员。即便抛出朱永嘉，也无法挡住造反派造历史系党总支和复旦党委的反的势头。事实上，在朱永嘉回复旦之前，11月16、19两日造反派早已开始猛攻历史系党总支和复旦党委了。

（4）朱永嘉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工作是上海市委派遣的。他回不回复旦参加运动，这取决于上海市委，复旦党委或历史系党总支均无权决定。

总而言之，“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贯彻后，党总支不再领导运动，我不便再干预保守派的活动，他们的批朱活动也未事先跟系党总支作过沟通，所以根本不存在党组织进行策划和操纵的问题。

（四）为什么连续三天批判朱永嘉的是保守派而非造反派？这里有个小背景，即：朱永嘉和历史系六位政治指导员邹万春、汪瑞祥、刘其奎、鲍怀崇、李华兴、吴维国有历史纠葛。

“罗思鼎”调到市委工作以后，其成员的活动基本都在丁香花园，他们集中精力看书、写文章，不参加基层的劳动和群众运动。这本来是党的工作需要，却引起了六位指导员的不满。文革刚开始，1966年6月，这六位指导员曾派代表找我，说“罗思鼎”的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运动，应该把他们撤回复旦，参加基层的运动，接受教育改造。我认为他们把“罗思鼎”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我对他们说，“罗思鼎”有缺点、错误，可以写小字报，从党内转到市委写作组，但要求他们撤回来则是不可取的；现在大敌当前，任务很重，我们要一致对敌，不应打横炮。我还说，毛主席说过，左派有错误，三年以后再说。六位指导员被我批评，闷不做声，但心里不服。

不久，我向朱永嘉转告了指导员们的意见。朱永嘉表示要接受党内对他们的批评，但也认为六位政治指导员的看法偏激，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甚至不怀好意。我把双

方的矛盾向复旦党委书记徐常太作了汇报，徐同意我的看法，建议我召开总支扩大会议，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问题。后来，在我主持的总支扩大会议上，矛盾双方发生顶牛，某些言辞已经比较尖刻、激烈。朱永嘉发言说，“某些人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我们在前线艰苦作战，你们在后面放冷枪，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党内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随后的总结发言中，我否定了朱永嘉“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说法，重申了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有同志式的态度，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能乱戴帽子。会议不欢而散，疙瘩没有解开，反而越结越深，这为后来六位指导员抢先炮轰朱永嘉埋下了种子。

10月以后，批判“资反路线”成为全国性潮流，不仅造反派在批，而且保守派也批（当然保守派的批判不是以“打倒一切”为目的），谁旗子举得高、行动的早、动作更迅速，谁就更主动。李华兴、吴维国等认为，如果再不积极批判“资反路线”，自己将越来越被动，换言之，必须积极“抢旗子”、争取主动。他们认为，历史系党总支虽然犯有“资反路线”错误，但程度并不严重，总体仍是好的，要采取“保”的态度；而朱永嘉的缺点、错误远比老余要多的多，而且文革之初曾给他们戴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大帽子，这样的党员干部应该“烧一烧”。因此，当造反派发出揪朱通令之后，保守派方面也不甘落后，决定抢先批斗朱永嘉。这些是文革结束后李华兴在深夜告诉我的。

（五）我公开宣布造反在1966年11月30日，这是无可奈何地跨上去的。其酝酿期很长，向前追溯，可至1966年林彪国庆讲话、《红旗》国庆社论、“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换句话说，公开宣布造反只是这些酝酿的最终结果。反过来说，促使我造反的因素有五个，即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的决策、“罗思鼎”的劝促、造反派的逼迫、姚文元的电话指示。这其中朱永嘉起了三个作用：（1）给我交了中央精神的底，起了政治思想的启导作用；（2）在我和造反派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两边联络，沟通了原本相互对立、敌视、不接触的双方；（3）在一个短时



间内保护了干部。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我可能早就被打倒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劝说我造反，使得造反派在一段时日里不好对我下手，某种程度上至少保我保到12月12号。

整理者注：

一、关于朱永嘉在北京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及朱给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余子道通风报信的时间，目前存在两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版本。一个是本口述历史中的余子道版本；另一个是《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页96-98）提供的朱永嘉版本，朱永嘉在这本回忆录中说张春桥、姚文元找朱谈话以及朱向余子道打电话通风报信的时间（内容是鼓动朱永嘉调转矛头，站到造反派一边，暗含鼓动其造反的含义）是1966年10月底11月初。不过，王一平讲话（录音整理）（《华东师大「五敢」版上海市委领导言论集》）提供了辨别上述两种版本的重要依据，王的讲话说「十·五指示」在上海正式执行的时间是1966年10月19日。根据这个王一平讲话，分析上述两种说法，我们会发现如下重要结论：（1）从信息的权威性来看，朱永嘉的通风报信，无疑不如「十·五指示」；（2）从发布时间、发布方式、措词来看，「十·五指示」比朱都要早、要明确；（3）朱的通风报信和「十·五」指示的真实性都确凿无疑。这样一来，余子道的版本比朱永嘉的版本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直言之，张姚接见朱，朱又给复旦通气的时间更为可能的是1966年9月底，而非朱所说的10月底11初。二、本口述历史据录音整理，经余子道本人审定，于2012年10月第一次整理，2014年3月第二次整理，2017年7月17日第三次整理，2017年7月19日定稿，2018年6月7日在微信公共号《党史国史研究通讯》首发。 ■

【人物】

## 齐晋华先生印象

杜莲子

—



十二月的青岛气温虽然有点低，但没有风，感觉还舒适，让人一时间忘记了还是冬天。

启之先生计划了好久，拜访齐先生，只因老齐对山东、青岛文革颇有研究。到了青岛才知道老齐多数时间是住在黄岛。青岛市区到黄岛的海底隧道全长七公里多，这是我第一次行驶，道路畅通，很快驶出隧道。这比过去的轮渡方便多了。

一进黄岛，就看出这里是新建区。设计是用心的，每幢建筑都别具风格，远远看去，结构简单大方，色彩淡雅，自然和谐。仔细品味这座小城，像是一个典雅的少妇，妩媚而不俗，且具有明快的现代感。老齐家就在黄岛的一个小区，等我泊好车，老齐和启之先生已走出很远，我望着他们的背影赶紧追随。这个季节小区树上零星地挂着几片枯黄的叶子，灌木只剩下干条了，凉亭孤寂地立在那里无人光顾。小区清扫得还算干净，青石板铺的小路直达楼前。

到了电梯前，两位先生在等我。进了电梯，我打量了一下老齐，中等个儿，微胖，紫棠色方脸，大耳朵，光头上刚长出发茬儿，两眼不大，略带点倦意。

二

电梯到了六楼。进了房间，是一室一厅一卫的精巧格局。让我惊诧的是，客厅里除了门窗，剩下的墙壁全被书架占领了。房间中间有个茶几，茶几旁边是沙发。老齐和启之先生没坐沙发，而是坐在两个小板凳上，继续讨论一路上探讨的问题。

我插不上话，便浏览老齐家的书架，书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老齐整理出来的资料。老齐是研究山东、青岛文革史的，书架上的资料在页版上登记得清清楚楚。从文革初期到末期，从山东地方到中央、从各大中专院校到军队的资料都被先生集中在这里了。我还没见过哪里有这么多的省市文革资料。我浏览了目录，没动书架上的资料和书，怕弄乱了，看得出老齐在整理资料上花了很多功夫和心血。

老齐正在给启之先生讲青岛文革中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我坐下来倾听，才知道老齐对山东、青岛文革研究竟是那般深入透彻、剖析入微。启之先生插空问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没等讲完，老齐就把话题转回到他的青岛文革研究上。之前我对他们研究的题目没有太大的兴趣，直到老齐拿出他的《青岛文革日志》，才令我眼前一亮。

这本书记载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青岛有关文革事情。

我接过这本书，从头翻到尾，一天不落。我被镇住了！这得下多大的功夫，查阅多少资料，拜访多少知情者，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财力，才能收集到如此完整详细的资料！

老齐说：“可以抹去岁月中的恩恩怨怨，但决不能忘掉和掩盖这段历史”。他之所以要真实、清楚地记载这段历史，就是要还原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真相。先生的执着和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打动了，感染了我，渐渐的进入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老齐收集文革资料，既不是缘于兴趣，也不是出自爱好，起因是文革开始的那年十六岁的他被莫名奇妙地抓起来，罪名是“渤海兵团”成员。老齐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组织，更别说是成员了，关了几天后，被释放出来了。他不服气，到处打听寻找这个“渤海兵团”，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老齐开始了解青岛文革，从此便走上了漫长的资料收集历程。

老齐说到如今，没想到这些资料对研究山东青岛文革的学者们有极大的用途。

在他们谈话的缝隙中，我问先生是一个人住这里吗？老齐憨憨地笑了，才对我们讲了，他家在青岛市区，因为研究文革，家里到处堆满了先生的资料和书籍。夫人很恼火，多次争执劝说不要再做这些事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先生执迷得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往

家里买书堆资料。夫人没办法，就在这儿给他买了这套小公寓。“由着他自己折腾”。这是夫人的原话。

这下子老齐更是我行我素，又大量地收购了一些民间收藏的资料。

我听了之后，扫了一眼靠窗的地面上那堆小报、印刷品和一些书籍。大概是刚收集来的，还没来得及整理分类。

老齐笑了笑又说：“不瞒你们说，我的工资根本不够用，我夫人见我买资料太能花钱，就把我的工资卡没收了，每月只发给我二千块，弄得我有时连饭钱都没着落，只好回市区吃夫人的。还好，这里的交通很方便，只是来回跑太耽误时间。”

说到这里，老齐又把话题转回到青岛文革研究上了。

### 三

老齐从卧室里抱出一叠资料。我看了一下，甚是了得。他把资料都做了塑封——我家的金箔也没这般认真地保存。随后老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塑封的旧报纸（1967年1月31日），铺展在沙发上，说这张报纸来之不易。找了三十多年，去年才在一个旧报摊市场发现了它。老齐说当时强压住惊喜，故意漫不经心地问摊主：这张报纸多少钱？摊主说十元。老齐二话不说，放下钱，拿上报纸就走。生怕摊主发现报纸的价值反悔。

我和启之先生接过这张带塑封的报纸，正反面都看了，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小报。正在疑惑间，老齐讲述了这张报纸的来历：

1967年1月31日，这天我起来较晚，不到九点，送报纸的邮递员来了。我接过《青岛日报》，拿回房间，坐在了床上，母亲坐在一边做针线活，我开始浏览这张报纸。29日晚上听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青岛夺权的报道，其中有青岛夺权时给《毛主席致敬电，告全市人民书等》，这些文件1月24日的《青岛日报》已登了。拿到了31日《青岛日报》，看到又是给《毛主席的致电和告全市人民书》我又翻出了24日的《青岛日报》。目的核对

这两份报纸上的文章，哪些不一样，所以看得很仔细。看到最后突然发现，最后一句：敬祝您老人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无寿无疆！

现行反革命！脑海里立即想起这个词。

那时我不到17岁，也是“无限热爱”的。马上指给母亲看。正说着，一阵急促的上楼梯声，邮递员一步闯了进来问：“今天的报纸呢”？我把报纸递了过去说：“有一句话，‘无寿无疆’，太反动了”。邮递员仔细看了看，拿着报纸，马上走了。

大约下午4、5点钟邮递员又送来一份重新印刷的报纸，上面是全“万寿无疆”。

听说收回的报纸仅留几份存档，然后由公安人员和报社人员送造纸厂现场监督销毁。

从80年代中期我就注意这张报纸，认为应该有没收回漏网的。到文化市场，地摊查找，跟许多倒腾旧货书籍报纸的人聊天，没有一个知道当年青岛曾有一份“无寿无疆”报纸。但我没死心继续寻找万分之一的可能。

去年（2017）年初在某处看到一份报纸，曲卷的很脏，边沿破损，关键的地方有个黑点，但看不清，要价很低，赶紧买了回来。用放大镜仔细辨认，就是那份报纸。

老齐边说边用手指给我们。我们凑上去一看，果然写的是“无寿无疆”。先生说那个年代谁敢说这样的话，肯定是失误。但是那个疯狂的年代是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件事的，肯定会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其结果可想而知。老齐后来听说从编辑到排版，报社处分了一批工作人员。

所以老齐对这张报纸印象很深。由于当时报纸回收及时，这一版报纸在市面上几乎没有留存，极为罕见。老齐介绍这张报纸的来源时，仍然掩不住当初发现它的欣喜。

老齐说起收集资料的艰辛滔滔不绝，但忘却了当时的辛酸，只剩下了收获的惬意。

说到后来，老齐才发现自进家之后，没给我们倒水喝，不由得满脸歉意，赶紧问我们渴不渴？好在我们听齐先生讲得痴迷，根本就没想到喝水。

## 四

德国科隆大学的文浩先生，听说齐先生收集了很多文革资料，就亲自赶到青岛，找到齐先生的家，看了老齐摆满了资料书架，很是惊喜。他在黄岛住了半个多月，翻阅并摘录、复印、拍照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决定将下一步的研究课题定位在山东青岛文革上。

老齐对自己能提供出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露出得意欣慰的表情。

在这物欲横流，追逐名利的年代，齐先生倾注半生心血，耗费钱财，契而不舍地收集和整理这些材料，为的就是保存历史，供研究者们使用。和那些为屯集渔利、待善价而沽的商贾不同，他不为金钱，与某些炫示珍奇异品，附庸风雅，博取名利的所谓收藏家也不同，他不图虚名，乐于分享。

老齐还自信满满地一再强调：“你们如果有学者也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尽管来查资料好了，应该还是比较全的。我这里也能住，宾馆钱都可以省掉。”

老齐说：他收集的这些资料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属于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研究历史的人。

## 五

齐先生在研究青岛文革史上也颇有成就。在我们临走时，他拿出自己的作品《青岛“八二五事件”》《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山东文革之四》送给我们。这是我们此行的意外收获。老齐说下一部书印刷出来了，会再给送我们。

从齐先生家里出来后我一直在想，在茫茫的人海中有这样的人，甚至是一批这样的人，不畏艰难、不畏困苦，在逆境中，执着的追逐着这个历史时期的真相，科学地论证事实和真理，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

这是什么样情怀？这是什么样的人生？

我想起高尔泰的一句话：“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

【综述】

##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概述<sup>1</sup>（节录）

——云南、山西、山东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启之

地方文革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党研系统、方志部门<sup>2</sup>以及国家机关单位推出的出版物（中共地方史、地方志书、组织史、大事记、校史、馆史、院史等，以及党史党建和社会历史人文刊物），二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的学术著述（包括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三是民间人士（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或离退休人员）撰写的，以自印、海外出版及互联网为载体的相关文字。

新时期以降，官方搜集、编撰、出版了成千上万册关涉文革的书籍，研究成果蔚为大观，<sup>3</sup>涉及到地方文革的出版物，主要有三，一是省地市县区各级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地方历史；二是省市地县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各地的志书；如当代地方简史丛书系列。三是上述两个部门编写的大事记、历史纪事等。<sup>4</sup>这三类史志著作都有参考价值，一般来说，中共地方史（第二卷）较当代地方简史详细。省志中的分志，如政党治、政权志、军

<sup>1</sup> 本文所说的文献，不包括文革时期的手稿、传单、笔记、检讨等原始记录的零次文献，也不包括文革时期的文件、报刊、讲话汇编、书刊等出版物构成的一次文献或曰原始文献。本文所说的文献，指的是文革之后产生的，与文革有关的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题目中的“文献资料”是“文献”的通常的用法。

<sup>2</sup> 1981年8月1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正式成立。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小组成员来自社科院、北大地理系、国家档案局、政协等机构。按照1985年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小组“从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各地修志工作，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并负责拟订编修新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的规划，制定并颁布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组织交流修志工作经验。”1986年12月，报经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领导下，自80年代初至1994年，“除台湾省另计，西藏未建立修志机构外，其它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先后建立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委会（或编委会办公室、总编室）具体组织实施的格局。”

<sup>3</sup> 1993年3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共展出已出版的各类志书、年鉴和其它地情类著作5000余种。

<sup>4</sup> 党研部门出版式的中共地方历史，通常分两卷，第一卷的下限是1949年；第二卷才包括文革。大事记也有这种情况——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部分。地方志系统出的大事记通常在通志或分志的前两卷中。网上流传的某某地区1966年至1976年的大事记，通常是摘自党研或方志的相关书籍。

事志、文化志等，会有关于文革的内容。而县志、区志、乡志、镇志中的原始资料可能会更多。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在谈到文革时，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在思想上，按照官方观点来解释历史；二、在史实上，笼统概括，大而化之，宜粗不宜细，忽略细节，得出结论；三、在写作上，叙述同质化、分析公式化、人物脸谱化、语言文件化。但是，从史料素材的角度来说，作为国家推动的历史研究项目和党史和方志部门的专业成果，这些出版物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文革时期的史料，因此，它们是研究地方文革的基本参考物。尤其是地县一级出版的当地史志和大事记（包括“历史纪事”），价值更高。事实也证明，这些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的信息源。<sup>1</sup>

高校和研究院所是文革研究的重镇，地方文革自在其中。但是，研究者——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从选题到搜集资料，从立意到成果的发表和出版，都会受到官方的干扰、限制和审查。因此，其学术性会受到一定的损害。尽管如此，其相关著述仍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革的研究，其成果理应受到高度的重视。

民间地方文革的研究和写作，情况复杂。身份上，这些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在体制外的移民国外的人，一类是在体制内的退休人士。思想上，这些人又可分三种：非主流的独立学者，主流的写作者，以及游移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人们。年龄上，这些人的主体是中学老三届，大学老五届和当年的干部。他们是文革的亲历者，对回首往事，还原真相，评说历史、褒贬人物有着较高的热情。而当年参加过造反，又被官方以“三种人”的罪名加以整肃的人们则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种身份的、思想的上差异和年龄上特点，使他们笔下的文革呈现出各种色彩。但总

---

<sup>1</sup> 苏阳在《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香港中文出版社，2016）一书中提到：“中央的政策以及地方的调查形成了有关文革期间集体杀戮有价值且详细的集体杀戮资料，其中的大部分被记录在了县志里并得以出版，但相关内容写得相当简略。除了少数几本之外，大部分县志都有‘大事记’这一部分。”见该书44页。西藏当代史学家李江琳（著有《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 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以及《藏区秘行》）告诉记者：“实际上我书中所用的资料只有少量是内部资料，大多是中国官方公开出版的。我从美国、加拿大的不少图书馆借调了很多资料，比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就找到了1958年的《青海日报》和《青海画报》；我手头的地方志有100多部，藏区已经出版的地方志我基本上都有。然后对地方志的每一个部分进行梳理，看看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然后跟公开和内部出版的中央文件对照，总是能找到前因后果。”



来说，不受当下意识形态的束缚，独立性强；记叙详实，有别于官方出版物。但是，个体的、自由的写作状态，“三无一压”<sup>1</sup>的政治环境，查阅资料的阻禁，搜集资料的艰难等实际问题，使民间难以出现严谨的、完整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文革史著作，散漫的、零碎的、回忆性、纪实性的文字占了多数。

在民间方面，地方文革的文献资料之保存、编辑、整理、研究与著述，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

一是文革文献资料的收藏家，如湖北的李晓航，山东的齐晋华，北京的王红进、广东的叶曙明，四川的王锐、樊建川等人。他们以个人财力，数十年间披沙拣金，收藏了大量的文革史料，为社会所用。其中对地方文革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李晓航，他将各省市区的文革史料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公布于网上，无偿地供人们使用，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

二是海外的专业团队或个人，作为团队，宋永毅等人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民间历史”网站，华新民团队主办的《华夏文摘》是地方文革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作为个人，加拿大华裔学者吴一庆主编的《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以个体之力，积数十年之功，不惮烦琐，分门别类，保存、整理了大量的文革史料，尽管其搜集的文献资料有重复和泛化的现象，但是这一交流网站以其及时更新和无偿服务为学者保存了大量文章资料，在国内互联网大量屏蔽、封锁网上的文革资料的情况下，显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国内的网刊，如《往事》、《记忆》、《昨天》、《往事微痕》、《黑五类》、《巴山夜雨》等。这些网刊出于民间，扎根底层，刊发了大量的地方文革史的文章，为独立学人和民间作者，提供了言说和交流的平台。

四是音像资料。李宇锋创办的文衡文化有限公司拍摄的文革文献片，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的文革纪录片，（如《我虽死去》、《寻找林昭的灵魂》、《为革命画画：户县农民画》、

<sup>1</sup> “三无”指的是无资金（没有研究经费，没有出书补贴）、无平台（没有公开的刊物发表，没有专业的会议讨论，没有地方展示成果，评比优劣），无出口（作品在国内无出版渠道）。“一压”指的是政府对民间文革研究的打压。

《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吴文光及其团队拍摄的文革口述系列纪录片，以及法国华裔学者迟淼拍摄的关于重庆武斗的纪录片《尸长的故事》等，也都是地方文革史中重要的文献。

五是出自网络的，关涉到各地文革的全景性或专题性著作。重要的如：水陆洲的《文革简论》<sup>1</sup>，刘朝驹的《文革史话》<sup>2</sup>和余习广的《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等。<sup>3</sup>前两书对各省市区的水文情况都做了专门的叙述。刘著资料宏富，虽未注明出处，但可作为大事记使用。<sup>4</sup>水著“把所有的有关材料全部罗列在一起，然后加上少许自己的话。”<sup>5</sup>余著对各地的暴力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与前两书一样，也是既无资料出处，又无参考文献。但对于有心的研究者来说，亦足资借鉴。

关于地方文革的文献资料，数量众多，良莠不齐，中英兼有。本文只取中文，不取英文。另外，历史研究包括对背景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从时间上讲是十七年，从空间上讲是北京和相邻省区。因篇幅和才力所限，有关各省区文革背景的文献，本文不予收录。具体的选取标准是：

1. 学术性的文字，本文将尽可能收入。凡成果卓著，贡献突出的独立学者，本文将重点介绍其人其书。但是，凡讲到了各省市区的水文情况的通史或专史，如上述刘朝驹、水

<sup>1</sup> 水陆洲是网名，其原名是王忠林。网上著名左派作家，2016年3月逝世。其所著《文革简论》是一本网络书。2012年修订。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电子文本和录音。共六编，第二编分上中下三册，上册第二章2—7节分别介绍了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六省市革委会成立前的情况。中编第四章分节介绍了新疆“石河子”事件，内蒙“二月黑风”，湖南取缔“湘江风雷”，青海大屠杀，四川成都“二月镇反”事件，武汉解散“工总”，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广州解散“省革联”，长春瓦解三大造反派组织，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武汉“七二零”事件等。中册第五章3—14节，分别介绍了青海、内蒙古、天津、江西、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江苏、浙江、革委会成立前的情况。下册第六章1—8节，第七章1—6节，分别介绍了湖南、宁夏、安徽、陕西、辽宁、四川、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革委会成立前的情况。该书诸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节概述，将文革发动至革委会成立这一时间发生在上述六省市的大事记和史料（电报、信函、大报的社论、小报的消息，中央的文件，毛的批示、紧急通告等）第二部分是本节简论。

<sup>2</sup> 刘朝驹的《文革史话》是一章回体的通俗历史读物。总字数约700万字，1390回，27卷，七部。在网上已经发表了1000回以上，还纸本出版了第一部《山雨欲来》，分上下两集，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sup>3</sup> 余习广是湖南常德澧县人，1973年的高中毕业生，后下乡插队。文革后入北京大学读研，获法学硕士学位，先在中央党校任教，旋下海经商，业余以研究当代史为职志。自称“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是他主持的当代国史系列之一。此书400万字，在其博客中名为《文革真迹：“红色武装割据”录》（1—115）。

<sup>4</sup> 杜钧福的《读刘朝驹〈文革史话〉》一文，对此文有较高的评价：“和一般所见文革通俗读物不同，该书取材相当严格，一般都言之有据，所以，又可以认作是非常丰富的文革材料汇编。其所搜罗的材料空前丰富，是我所见关于文革的书籍、大事记远远不能比拟的。作者严格按时间顺序叙事，尊重了历史事实，但舍弃了可读性。作者没标明引文，当然也没给出出处，作为学术研究工具有缺陷。但作为大事记绰绰有余。（网文）”

<sup>5</sup> 卜伟华《值得注意的水陆洲现象——水陆洲〈文化大革命简论〉》网文。

陆洲和余习广等人的著作，本文不予收录，以节省篇幅。

2. 回忆性的文字，无论是官方出版还是民间自印，抑或网文，凡有参考价值者，本文尽量收录。考虑到海外出版或民间自印的著作，一般人士难以获得，本文会做略作介绍。

3. 资料性的文字，凡是文革时期产生的文献资料，除了个别例外（如汝其的支左）外，本文概不收录。李晓航编撰的各地文革史料编目，因已是“地方文革交流网”上各省市区必有的常设项目，成为不说自明的文献资料，所以，本文亦不收录。

4. 文艺方面的文字，以史料为主，评论酌收。如贵州诗人哑默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地下诗文。文革后多有评论。本文仅取其自编的“地下写作”的第一手材料《真与美》。

5. 各省省志、通志下面的某些分志分册中，会或多或少地含有与文革有关的内容，如前述政权志、政党志、军事志等。因其卷帙浩繁，无法一一寻检。故本文不收。

6. 各省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资料，因已另有专题综述，本文不收。

7. 回忆录、纪实、口述、访谈等文字甚多，本文择要收录，以十篇为限。

有几点需要说明：

1. 由于地方文革史的文献资料来源庞杂，为了眉目清楚，本文大体上以（1）史志/大事记，（2）学术研究，<sup>1</sup>（3）回忆/述往这三部分，作为叙述诸省文革史文献资料的基本结构。个别的省，会出现第四部分，如资料，或纪实。

2. 为节省篇幅，在本文中频繁出现的某些固定词组，如“XX出版社”、“中国共产党X地历史”、“中国共产党X地历史大事记”等，笔者将使用它们的缩略语。如省掉XX出版社中的“出版社”，省掉“年”。

3. 由于本文要提到大量的著作，凡出自互联网上著作，本文均不注出处。在纸媒上发表过而又有上了网的文字，出处亦免。

---

<sup>1</sup> 笔者认为，如果以独立性和自由度为标准，大陆的文革研究由高而低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间人士（体制外的，包括离退休者）的自主性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高校和社科部门的专业性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党研和史志部门的任务性研究。本文中的学术研究指的是前两个层次。本文将学术研究单列一项，是为了与第三个层次——党研和方志部门的出的史志有所区别。众所周知，大陆出版的中共地方史和地方志是要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编写的，是要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才能出版的，因此，这类著述的学术性必然要受到损害，而低于前两个层次。

4. 因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所论范围仅及文革时期的 26 个省区，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本文的叙述顺序是东北三省（辽吉黑）—华北两省一区（冀晋内蒙）—华东六省（鲁苏浙闽赣皖）—中南四省一区（豫湘鄂粤桂）—西南三省一区（蜀滇黔藏）—西北三省两区（陕甘青宁新）。

在本文的修改中，笔者曾向周孜仁、张业赏、崔金珂、齐晋华、何蜀、董国强、陈益南、谭迦洛、孙言诚等多位研究地方文革的专家征求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反聩和指正，谨此致谢。但笔者积累鲜薄，苍黄上阵，挂一漏万，势所难免。正误补隙，还待方家。

## 云南

### 一 史志、大事记

在高度同质化的官史中，《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2004）将云南文革的两大特色：“划线站队”和“政治边防”及其恶果（如“沙甸事件”）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在资料性的书籍中有两本书价值较高，其一是云南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2005年5月内部出版）此书“是官方出版的最权威、同时也最为民间最关注、引用最多、争议亦最大的一本官方著作。”其二是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的《历史的见证（云南文革史料选编）》（2007年编印），“此书的特点是原始资料较多，而无评论。”<sup>1</sup>

另外，值得参考的还有《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1950—1999）》（云南人民，1999）、《中共昆明历史大事记述（1949.12—1978.12）》（云南人民，2000）等官方出版物，这些书中对谭甫仁的极左政策及后果有较多记载。

在云南省下辖的 8 个地级市中，昆明、曲靖、玉溪、昭通、丽江、保山都有时间跨度不等的，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大事记。不过，曲靖、保山的大事记是“内部资料”，不是

<sup>1</sup> 这里提到的价值较高的两本书，都是周孜仁在审阅云南部分之后补充的，文中引号的部分来自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他给笔者的电子信。特此说明，以示谢意。

公开出版物。<sup>1</sup> 而普洱和临沧虽然有多种大事记，但都不包括文革时期。

在云南省下辖的8个自治州中，西双版纳州只有文革后的大事记，德宏、大理、怒江、迪庆四个州的大事记的跨度都是五十年左右。<sup>2</sup>红河、文山的大事记都是从公元前记起，跨度二千多年；<sup>3</sup>只有《中共楚雄州大事记》（1966年—1976年）居然把文革时期单列出来。作为官方出版的另外一本比较有价值的是：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2007年编印的《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此书的特点是原始资料较多，而无评论。

## 二 学术研究

在民间的独立学者中，研究云南文革最有成绩的是周孜仁。他撰写的《云南文革笔记》（台湾，秀威资讯，2015）从1969年2月分配到云南调到省委担任秘书写起，一直写到文革结束。这七年间，云南发生的大事小情：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推行“划线站队”的极左政策，被保卫部干部王自正枪杀于寓所，其夫人王里岩同时遇害。周兴继任，践踏民族政策，激化汉回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沙甸事件”。通海等六县发生7.8级大地震，死者一万五千，死绝836户；伤者近三万，而媒体隐而不报，政府送灾民十万毛像章以示关怀。林彪叛逃引发的云南军区大清洗、昆明政局变幻莫测，批陈整风、批林批孔，省革委会主贾启允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反戈一击等等，书中都有详实描述。

与一般的文革史著作不同的是，此书不仅描述了昆明上层的政治，而且眼睛向下，关注下层民众的疾苦。与一般的作者不同的是，周孜仁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与文学家的神思文采无缝对接，在写史的同时，精心营造气氛，刻画人物。故其文摇曳生姿，生动可诵。此书分四卷45节，约40万字，《记忆》主编启之以《思痛之华》一文为序，专事推荐。

<sup>1</sup> 《中国共产党曲靖市历史大事记述》（1950--1997）（内部资料，1997）；《中共玉溪历史大事记》（1950.3-2000.12）（内部资料，2016）；《昭通60年大事记：》（1950-2010）（云南人民，2011）；《丽江地区大事记》（1949.10-1996.12）（云南人民，1998）；《保山地区志稿》第一编·大事记（一）（内部资料，1987）《保山地区志稿》（第一编）（内部资料，1987）。

<sup>2</sup> 《五十年激情飞越——德宏建州50年大事记》（1953--2003）2003；《中共大理市党史大事记》（1950—1998年）1999年；《中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党史大事记》（1948-1998）1999；《迪庆州建州50周年大事记》（1949—2009）2010。

<sup>3</sup> 《红河历史大事记》公元前111年红河地区有历史记载到2013年6月共212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文山大事记》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改革开放。（德宏民族，2013）

“赵健民特务案”是云南文革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丁龙嘉、听雨撰写的《康生与赵健民案》（人民出版社，1999）以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为主线，叙述了云南的两派（“八派”与“炮派”）的之间从思想分歧到武斗，以及“滇西挺进纵队”等大量冤假错案的形成、发展和平反的过程。另外，丁龙嘉还有《赵健民在20世纪50年代反“左”》一文（2012年第10期《炎黄春秋》）

### 三 回忆、述往

与文革有关的传记、回忆等作品，除了省一级的领导人物，如《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1987），孙雨亭《历史的选择：我的回忆》（云南人民，1996）的出版物外，还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物，主要有：

1. 刘殷农《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自印本，2013）。刘是云南造反组织823派的二号领袖，是云南文革造反派领袖中唯一写了回忆录的人。<sup>1</sup>

2. 万国祥《风雨人生》（自印书，2005）作者时为昆明市委党校副校长，书中记述了昆明市文革情况。

3. 熊景明《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2010）作者时为云南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此书的第五、六两章讲到了昆明和澄江的文革。

4. 肖健卿《难忘春城六日——阎红彦上将陨落之谜》（见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2011）作者时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1967年初派往云南，了解当地文革。此文是他在昆明的所见所闻。另，这本书中，还收入了崔俊峰《昆明两大派的争斗与初步联合》一文。作者当时亦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1967年5月底派往云南，了解昆明造反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的武斗。此文是他写的报告。

---

<sup>1</sup> 周孜仁曾建议作者刘殷农修改此书，并提出具体的删增意见。刘殷农同意，但其未及着手即于2014年秋病逝。周孜仁认为，此书“虽有殊多不足，亦留下许多可贵史料。”引自2017年7月21日周孜仁给笔者的电子信。

5. 王铮《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1-21）此文发表在“王铮科学网博客”。作者时年12岁，为云南陆良县盘江小学的学生。此文是他的长篇回忆文字，记叙了1966至1971年当地的文革：从县里形形色色的造反，到炮派的失败；从叔叔被揪斗，到生产队长如何对付谭甫仁的“水稻密植”。其中写到了很多细节，真切而生动。同类的书还有赖聪《嬗变：我们的那个时代》（时代出版社，2013）作者时为昆明师范附小三年级学生，书中记述了一个小学生眼中的当地文革。

6. 马荣升《我所亲历的云大文革运动》，作者时为云南大学理科二年级学生，退休前任云南省腾冲县教育局局长。此文讲述了云南大学等院校的文革，至1970年学生毕业分配，离开云大校为止。

7. 杜占池《文革亲历记》（1-12）作者是中科院综考会农林牧研究室的科研人员，1972-1976年，作者在中科院植物所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工作期间，曾到云南调查紫胶的生长和生产情况，文中讲到了玉溪、红河、文山等地的文革（见第四、六两节）。

8. 杨献才《麻栗坡文革点滴回忆》麻栗坡是个县的名字，此县在云南省文山州东南。作者时在县里的教师，参加了造反派，文中记述了军管前县里发生的多起乱杀人的事件。

9. 王希圣《我所经历的云南思茅文革过程》作者时为“四清”工作团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正在思茅“四清”。全文16节，从北京来的两个红卫兵讲起，一直讲到1969年思茅地区的五·七干校。可以看作思茅地区的文革简史。

10. 尹家民《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作者是军旅作家。此文简述了文革中的昆明军区发生的种种恶性事件：阎红彦上将自杀，谭甫仁中将被刺，朱家璧少将跳楼，以及秦基伟中将、李成芳中将在文革中经历。

## 山西

### 一 史志、大事记

在官方出版物中,两本省级的史书——《中共山西历史》(1949-1978)(中央文献,2001)和《当代山西简史》(当代中国,1999)都以三章一百页左右的篇幅讲述了山西的文革。资料性的图书《中共山西历史纪事》(1949-1976)(中央文献,1999)为11个地级市树立了样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历史纪事”——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榆次、长治、晋城、运城。以“大事记”作为书名的只有临汾和太原。<sup>1</sup> 展阅这些“纪事”,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就是按中共的规定把历史分成若干时期的大事记,在各个时期下面编年纪事。

山西的方志部门,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承接了从省级通志到市县分志的系统工程,三十多年来,成果累累。地市县方志的开篇,常见这样的说明“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境域为主,重点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也就是说,这些方志包含了文革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地区如《太原市志》不但有本市的河西区、北城区、南城区的区志,而且也将集义乡、上兰村、武家庄等乡镇村庄纳入修志的范围。

## 二 学术研究

在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中,山西民间的独立学者贡献最大。至少有两部书,在文革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部是由集体写作,石名岗执笔的《文革在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上下卷,共十三章57万字,书后附有参考文献和四个附录,2014年自印),这本书彰显了民间反思文革的深广,展示了学术独立的力量,丈量出官方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巨大差距,烛照出党国机构与御用史家的丑恶与可耻。此书不但有着澄清山西文革历史史实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国内外的地方文革史的编写提供了思路、

<sup>1</sup> 《中共大同历史纪事》第二卷(1914—2014)(中共党史,2016)、《中共朔州历史纪事》(1937.1-2003.2)(中央文献,2004)、《中共山西省忻州历史纪事》(1919年5月-2000年12月)(山西人民,2001)、《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区历史纪事》(中共党史,1998)、《中共阳泉市历史纪事》(中共党史,1999)、《中共山西省榆次历史纪事》(1949-2008)(中共党史,2008)、《中共长治历史纪事》(1949年8月—2002年12月)(中共党史,2007)、《中共晋城历史纪事》(1949-1985)(中共党校,1999)、《中共运城市历史纪事》(1950~2003)(中共党史,2005)、《中共太原历史大事记》(1919—2014)(中共党史,2016)、《中共临汾历史大事记述》(中央文献,2013)



框架和方法。

就学术而言，此书首先“跳出了毛泽东语境，力求以开放的眼光，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把山西的人和事放在中国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的长河里考察。”作者“搜集了大量一手史料，正视各种矛盾，对复杂的头绪条分缕析，提供了毛泽东时代地方政治的一个珍贵样本。”（丁东序），而作为历史书籍，此书最大的贡献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是造反夺权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异常惨烈，三是所谓“大寨红旗”的样板给全国农村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这几方面的历史真相，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记叙和反思，而这些内容在以往的官方史著中是很难看到的。”（何蜀序）就叙述和表达而言，此书“文字干练有力，其优异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绝非那些精神本质完全异化至今仍保持文革思维和大字报水平的造反派人士所能比。”（周伦佐评）

当然，此书也非尽善尽美，其主要问题是，第一，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极左、四人帮等缺乏明确的定义。第二，结构上较松散，一些章节应该压缩删汰。以提升处理上层政治背景与山西官场斗争及群众运动之间的水平。第三，在叙事上，吝于剪裁而拙于概括。前者主要表现在书中有大量的应该删节的议论。后者主要表现在书中的大量的几百上千字的引文。第四，对官史中的错误（如段立生序中所说的官史对真相“采取掩耳盗铃之手法，隐瞒，省略，近乎不提。”没有针对性的指正。

第二部是被评论家与《中国农民调查》和《墓碑》相提并论的《虔诚的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共十一章，40余万字，2009年自印）。这本书的作者孙涛是山西大学中文系70届毕业生，出过十余部小说，当过文学刊物的主编和太原作协主席。

此书以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为划分标准，将山西文革分为五个阶段，<sup>1</sup>书中的主角——

<sup>1</sup> 这五个阶段是：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四、由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在五个阶段的活动，构成了此书的基本线索。与一般的写人物的纪实作品不同，作者既有宏观视野，又注重史料，以反思历史为出发点，求真求实。“力求以真实作为基础，展示山西十年文革的全景。不因尊者讳，不为贱者隐，尽力还原历史的原生态。”（作者题记）

作为山西十年文革的亲身经历者，侯光天读罢此书，“没有感觉出一丝的虚假和作伪。”尽管作者“用了文学语言，有的地方用了推断和理论解析，但都没有使文章失去真实性。它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史学价值。”（序一）赵瑜在批评官史理论，把造反派“符号化恶魔式”，“构成了新的心灵冤案，远离了科学探索精神。”称赞此书的写法：“国内文革研究成果本来就稀疏罕有，在仅有的少量著述中，又往往重事轻人，使得后来者看待文革，总是云里雾里，瞧不清庐山真面目，亦不知究竟是何种力量，推演民众文革巨潮翻滚。而轻视写人或者不敢于写人的结果，只能是连基本事件也说不清楚。……文学作品写人更研究人，《虔诚的疯狂》正是抓住了这个重心，从历史人物本事出发，留给了读者一部真实的山西省城文革风云录。”（序三）

此外，孙涛还著有一些关于山西文革的文章，如《分解一下山西文革五个阶段》、《太原文革运动的兴起》、《太原五中成立的七一战斗小组》、《真实的印痕：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就〈虔诚的疯狂〉书稿再说点题外话》、《我的大学生活》等。

关于山西文革的学术性文章，还有：

1.钱理群《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载《记忆》181期，又见《燭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此文是一篇研究性书评，所评之书是山西文革的亲历者集体编写的一本近百万字的《文革中的山西》（石名岗执笔，上下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出版。

2.张东明《文革时期的山西夺权研究》（2005）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

3.牛崇辉《文革时期山西经济建设述评》（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第二期）

4.黑老赵《山西省文化大革命概述》（郜银林收集整理，收入郜的博客，资料16《忻州有关参考资料》中）。全文六万余字，分为六部分，从文革前的山西省情讲起，分别叙述了山西文革的三个时期（卫恒、刘格平和谢振华），对1966年至1969年三年间山西的文革有较详细的记述。文中有几个附录：山西领导班子名单、“炮轰省委派”五大组织的介绍，参加夺权的24个组织名录，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此文经过郜银林的收集整理，收入郜的博客，资料16《忻州有关参考资料》之中。

5.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文革在山西》一书对此文多有征引。）

### 三 回忆、述往

在关于山西文革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评传一类的书，除了《卫恒之死——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长书远寄——王大任回忆》、《百战将星——谢振华》、《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历程》、《赵树理传》、陈徒手《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等出版物之外，民间自印书，或互联网上的某些故隐其名的网文也有很多，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推李辅的《所思所忆七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12）。

作者是山西应县人，少年时，因父亲蒙冤入狱，升学无望，转入农校，再入省党校。后任职省委政治理论调研室。文革初，因看不惯省领导及其家属的骄奢生活和霸道作风而造反。担任省直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负责人，并当选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七八十年代，先后任襄汾县委和平遥县委书记。履任之处，重民生，解民冤，深得民心。1984年被定为“三种人”，撤职出党。作者在书中“写出了自己七十年所做的事，写出了一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写出了自己的所忆所思。……即便对邓小平，也直抒所思，毫无避讳。”（吴象序一）丁东认为：“此书的价值除了政治史方面，还有社会史方面。……其中有的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的是人们比较陌生的，是史家不曾记载的，这就更显可贵。”（丁东序二）

还有一些回忆性文字，也值得一提，如：

1. 高兆忠《狰狞岁月愁：1957—1979》（自印书，1999）作者原任山西省委党校付校长，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此书揭露了1957年省委党校校长李慰等人如何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把他打成右派；省党校校史如何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等。并且记述了作者在文革中的遭遇。

2. 佚名《文革亲历记》作者当时在省革委办公厅常委秘书组工作，此文讲述了中央给山西办学习班的情况。

3. 《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1-8)，此书讲述其父（1966届毕业生）1968年分到太原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到太钢与奥地利和西德专家搞顶吹转炉的事。

4. 《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作者时为太原机械学院的学生，书中记述了太原的文革情况。

5. 愚人《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记忆》第40期）作者是同山西歌舞剧院的小提琴手兼乐队副队长，文革中因站错了队被打成另类。此文记叙了太原文革中的两派，记述了到歌舞剧团支左的三批军宣队，军人们政治上的极左、生活上的贪腐，以及无中生有地抓阶级斗争等等，尽收笔端。

陈永贵是山西的名人，关于他的书，最早的是资深报人冯东书写的《文盲宰相陈永贵》，此后有中央调查组成员陈英茨写的《陈永贵本事》，吴思《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以及段存章的《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个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等。

#### 四 纪实、纪事

1. 赵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2013，自印），此书写的是1966夏到1969夏三年间晋东南的文革。作者关注的是群众运动和两派斗争，笔墨主要集中在“联字号”和“红字号”两派上面，武斗是全书的重点。用评论者的话说，作者的初衷是“以一个地区为基础，全局性地展现那场酷战的真相。”（朱竞评论，网文）作者家在长治地委，当时正在上小学。书中有亲历者的回忆，有当时的信件，有当时人的口述，对了解山西晋东

南的文革有帮助。

2. 谷峰《新太原 50 年纪事》（上中下）（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作者程太生，笔名谷峰，毕业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武警部队作家。此书的中集《十年风雨》写的是一个民间史志学者眼中的太原市的文革史。据作者说，他的书与官史多有不同。另有《父亲 1967 “支左” 轶事》、《省城太原文革十件大事》等文。

5.晨蓝新光/编著《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纪事》

6.郜银林《忻中文革略记》《五台县文化大革命简述》《代县文革点滴》《忻县中学文革小报》《忻县的“教育革命”和“小反革命”》《忻师文革略记》（与阎琦圣合写）

7.余习广、杨昕《山西平遥武斗及“八”七”事件、“八”九”事件》。

## 山 东

### 一 史志、大事记

山东省下辖 17 个地级市，这些市都出了本市方志，各志中都有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大事记”。《山东通史·当代卷》的《通纪》上册第三章专讲文革。

在史书方面，《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中共党史，2001）、《中共山东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11）。《山东四十年纪事》（山东人民，1989），《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1989）以及吕景琳、申春生主编的《山东五十年发展史 1949—1999》等是研究山东文革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山东下辖的地市县也出版了当地的党史，但其对史事的叙述粗细不一。比如，王效禹在山东搞的“三反”（“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博山、栖霞、肥城等县党史就一带而过，而诸城、郯城和临沂等地区的党史则有较详细的叙述。这一差异，在山东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揭袁”<sup>1</sup>运动上也显得很突出，有的县党史，对揭袁批袁只字不提，

<sup>1</sup> 袁，指的是山东省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1973 年 1 月 5 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向中央汇报说，“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山东”，“省委、济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1974 年 1 月 11

有的则记述详瞻。文革十年的地方大事记似乎更具参考价值，如泰安、天桥、槐荫、峰城、沂水、城里二村等。

## 二 学术研究

关于山东文革的学术研究，张业赏是第一人。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搜集散藏在民间的大量文革文献，在撰写《中共山东历史》第二卷的时候，又有机会翻阅了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文革档案。在撰写博士论文《山东“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论文，2010）的过程中，他还采访许多文革当事人。这使他对山东省的文革历史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的博论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写起，一直写到1971年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其文对山东文革的史实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山东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全文三十余万字，是第一次对山东文革史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另外，张业赏还有：《1966年山东大学的文革》、《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1967年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东岳论丛》2009年第10期）；《孙安动本的台前幕后》（《春秋》2010年第3期）等文章，亦为研究山东文革的必读之作。

另外，还有几个人值得一提：

文革资料收藏家刘建华（笔名：齐晋华等），他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对山东文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如《青岛八·二五事件》、《五十、六十年代山东宗派争斗》、《齐鲁三年枭雄王》、《“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乱中夺权的青岛1967年1月》、《青岛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5~1969.12）、《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1967年1至4月）、《山东临沂文革概述》、《山东潍坊文革概述》、《青岛文革期刊〈主沉浮〉》等。在作者撰写的诸文中，传播最广，转载最多的是

---

日，中共中央发文撤销袁的职务，决定在全省开展“批林揭袁”运动。见《中共诸城地方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页344。

《受“林彪事件”牵连的开国将军们》一文，文中刊发了多份有编号的中央文件，列出约30多名受牵连将军，除了黄吴李邱之外，中央文件点名的还有梁兴初、周赤萍、袁升平、温玉成、易耀彩、南萍、程世清、龙书金、王秉璋、丁钊、刘锦平、刘丰、吴宗先等。文章还说明了为什么对肖劲光、杨得志只是批判而没有点名。

2. 山东党研单位的研究人员丁龙嘉，有多篇论文问世：《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和《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3. 原北大硕士，现在的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崔金珂。作为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文浩研究团队的成员，与文浩一起，从搜集山东史料入手，对山东文革史做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山东文革史的专题性研究。

“破四旧”、夺权、“斗批改”和“批林批孔”一直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关于山东的文章主要有：

1. 首都师范大学黄延敏教授。其博士论文《“破四旧”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7）运用了济南市档案馆中“破四旧”的资料，是研究文革初期山东省的红卫兵运动及其“破四旧”规模、范围的重要学术著作。

2. 冯娜《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硕士论文，2010）作者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

3. 李先明《“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及其影响——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中共党史研究》，2012/8）

4. 张宁《文革初期山东“二·三”夺权评析》（硕士论文，2009）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员。

5. 林林《文革时期滕县粮食生产研究》（硕士论文，2006）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员。

6. 左进峰《“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的教育革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7. 刘伟燕《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的“批林批孔”运动》（硕士论文，2013）作者是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

### 三 回忆、述往

关于山东文革的回忆录、传记、纪实、口述等，官方出版物不少，如《谭启龙回忆录》、《袁升平文革回忆录》、《袁升平口述》、《杨得志回忆录》。将军们似乎更热心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文革时负责山东“支左”工作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67军军长李水清，写了《李水清将军回忆录——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67军政委，也参加了山东支左的王金泉，也写了回忆录《经历与见闻》。

之外，还有——

1. 穆林（时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年革命工作纪实》（山东人民，1998）
2. 秦和珍（时为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秦和珍回忆录》（山东人民，1998）
3. 张敬焘（时为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敬焘回忆录和纪念文集》（中共党史，2012）
4. 冯乐进（文革后任山东省司法厅长）的《百年纪事》（内部印刷）
5. 冯毅之（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的《阳春勿忘三九天》（内部印刷）和《风雨沧桑一百年》（香港，天马出版社，2002）。

6. 刘建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此书的第23--27章写到了山东文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遭遇。

7. 韩金海（当时山工总头头，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韩金海回忆录》（未刊稿）。

民间的回忆书文主要有：

1. 知侠、真骅《黄昏雨》（青岛出版社，1994）知侠即刘知侠，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时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东分会主席。文革初即被打成“黑线人物”。真骅是其妻。此书是两人的通信集，其中记述了当地的文革。

2. 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1999）作者时为临沂的中学校长。此书



是他的文革回忆录，记述了临沂市的文革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感。

朱瑞福《从农民到高级编辑》（三联，2013）作者是山东寿光人，时任寿光县委秘书。此书是他的回忆录和日记选集，其中第五章是文革纪事，包括文革日记四篇，回忆文革六篇。第六章中的“1970年青岛济南淄博德州外调”和“省委党校进修日记选”等节。

3. 张宗鲁《从我文革期间被判刑十年说文革》作者滕县龙阳公社冯营大队人，时为山东大学电子系二年级学生，因参加造反。1968年被王效禹打成“现反”，罪证是撰写五篇反动文章（《“极左派”万岁》、《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与解体》等五篇文章），1969年被开除学籍，1970年被捕，1976年滕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其徒刑十年。文革后未得平反。此文讲述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撰写文章的主要观点。

4. 臧亦夫《臧亦夫自述》（湘人书坊印制，2009）作者时为山东省城建局的干部，此书第七节讲述了他作为一个“摘帽右派”在文革中的遭遇。

5. 半湖居士博文。作者时为济南一中的学生，其博文内容丰富，有谈往，有口述，有老舍在济南，总之谈济南文革的文章很多。

6. 雷运河《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1-3）作者不详，此文国内网上只有第一部分“初战告捷的欢歌”，分两节：一革命干部的思考，二革命风暴前的沉默。

7. 《山大文革琐记》作者时为山东大学的学生，全文共十六节，从1966年“吴富恒副校长被抛出”开篇，到1969年“翻案兵”结束。

8. 苏鲁边河《我的1966—1974》作者时为山东Y县的高三学生，文革初到下面的公社中学做代课老师，文中记述了文革初期学生揭发老师、批斗县委书记、步行串联等情事。■

## 【综述】

## 山西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概述·山西》补遗

杜钧福

关于山西省文革背景材料，有一篇文章不能不看。曾任太原市长、市委书记的山西省老干部韩纯德曾于2003年接受访问，发表题为《华北党的封建性》讲话（华岳论坛，2003），嘱身后发表。他说的“封建性”主要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干部的人身依附性。所说的“华北党”指山西、河北两省。具体的说，就是河北的事要听彭真的；山西的事要听薄一波的。实际上，中央大员分管地方已为惯例，山西、河北两省特殊之处在于，其他省份，例如南方各省，领导干部主要由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南下干部三部分组成，有相互制约机能。而华北地区，基本上是从抗战以来就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当政。中央任命的也大多是这样的干部。外来干部也任命过，但在本地无人脉，呆不长。韩纯德说山西就像薄一波的“根据地”，干部们不断向其“朝贡”。每逢薄过生日，山西几大领导班子都去，实际上是个“政治交易会”。但是本地干部之间也有畛域之分。持续了几十年的干部自我繁殖机制留下很多隐患，至今山西、河北两省在吏治方面的积弊无不与此有关，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的进程。

山西省文革史料之丰富，功劳还归之于几位作家致力于文革题材的创作，多为报告文学体裁。这些作家描写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比较客观的立场，很少有明显的“派性”，并且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而且一般是多视角的。但是从历史学家看来，有些作品可能比较缺乏对历史事件社会背景的考察和分析，这当然不能苛求于这些作者们。除去孙涛、赵瑜、谷峰以外，还有一位作家毕星星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文革题材的随笔，散见各处，主要有：《种一个毛主席万岁》（《炎黄春秋》2009年11期），《〈三上桃峰〉和它的作者们》（作者博客，2012），《革命轮回的牺牲品——读李辅〈所思所忆七十年〉》

（作者博客，2012），《〈种一个毛主席万岁〉又出新证》（作者博客，2013），《〈三上桃峰〉平反的标志性意义——访问曲润海》（作者博客，2014），《那年我们接待阿尔巴尼亚农业部长》（《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9日），《女学生小于搭便车》（《南方周末》2014年11月29日），《平反〈三上桃峰〉的一波三折》（《炎黄春秋》2015年5期），《文革十年的山西文坛》（作者博客，2014），《文革中的性压迫》（“共识网”，2014），《四十年前的一桩乡村言论专案》（《随笔》2015年3期），《听劳模讲话》（《南方周末》2015年3月26日），《一家地主子女的人生悲歌——乡村档案之二》（《随笔》2015年4期）。他还有一些评论师东兵著作的文章。

熟悉山西文革过程的作家丁东有《鬼门关前涉险生还的张赵集团》（360doc 个人图书馆，2013）一文，描写文革后期这一重要事件。附带说一下，山西女作家蒋韵的一些涉及文革题材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我的内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中篇小说《落日情节》（《上海文学》1990年11期）等被评论定位为“女性悲情书写”，早已摆脱了“伤痕文学”的套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追寻宏大的主题，因而升华到新的境界。研究工作中，尚可见南京师范大学张宁的硕士论文《文革期间山西夺权研究》（导师经盛鸿，2009），但感觉缺乏新意。

太原市高等学校的文革回忆录，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的《说出我的故事》最为重要。另一现网名壁马翁的该校学生，有回忆录《往事琐忆》（作者博客，2011），记述该校文革事。作者也是造反派“红旗”成员，其父亲是个小商人，文革前去世，但在文革中由于这层关系遭到抄家，母亲做为‘资方代理人’遭受了批斗、游街、专政、牛棚的非人待遇，痛不欲生。作者感叹道：“庄严国旗的一颗明星，却被抛弃了，而且与黑五类归为一体，成了专政的对象。这戏法变得也太快了！”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1966年6月21日全校揪出61个牛鬼蛇神游街示众事恐有误，按道理可能是8月21日。

山西大学的文革资料较分散。有原数学系学生的回忆录《我的七十年》（360个人图书馆，2010）叙述该校文革初期一些事件以及后来两派斗争事。聂维清《煤海摇篮》一文

的第二章《“文化大革命”中的山西矿院》（山西矿院校友网，2007）简要叙述山西矿业学院文革初期到1972年招收工农兵学员一段历史。

中学文革方面，除孙涛所描写的有关太原五中内容外，原太原十六中初中三年级程姓学生《山西文革亲历亲闻》博文系列值得注意（程门不远（程门步远）博客，2015）。这一系列原有四部分：一、山西文革大势，二、太原十六中文革全记录暨化工地区文革纪略，三、一些单位文革见闻，四、一些大案。现在只剩一、三、四部分。作者所记录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现象，因而所有部分都很有参考价值。

太原的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方面，孙涛文章和后面所说余汝信、曾鸣文均引《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组织史资料（1924——1987）》（太原市委组织部、党史研究室、太原市档案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数据：文革初期，太原市以地、富、反、坏、右等名义遣送农村人员有11435名，随行家属有15444人；非正常死亡671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24人。和其他省市比较，这一数据已经很惊心动魄了，但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均感严重不足。

除去孙涛文章涉及山西各省市的夺权问题外，余汝信、曾鸣《文革中山西的专区、省辖市夺权》（《记忆》2013年总98期）一文资料丰富、组织严密、符合学术规范。具体到各地区和市的有关文献如下：

**晋中地区** 此地区最接近省城太原，文革中派性斗争也最激烈，但缺乏独立的完整叙述，主要脉络可见《文革中的山西》有关章节。

文革初期在晋中发生的最大事件是平遥武斗。属于“平遥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派的王振颖口述、指尖平遥整理的《文革记忆》系列（作者博客，2017）较详细描述平遥县文革初期形势、两大派的形成，以及冲突过程。这个指尖平遥还整理了其他人的一些回忆录，配以插图，自称“用通俗的语言，独特的视角，讲述平遥不为人知的野史趣闻，讲述你所不知道的平遥人”。此外，参加这次“解救陈永贵”行动的云海山人也在博文《回忆平遥武斗》（云海山博客，2005）中简要叙述了这次事件。

晋中地区形势之复杂、武斗之激烈是和全国劳模陈永贵的参与分不开的。关于陈永贵和大寨有许多参考资料，此处推荐《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孙启泰、熊志勇，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一书。其中一半以上篇幅叙述文革期间大寨内幕。

晋中地区有一个平定县。两位平定中学校友郝志东、黎明根据对大量当事人的访谈，积累资料，撰写了《平定县里不平定——山西省平定县文革史》（致知学术出版社，2017）一书，叙述该县文革全过程，为县级文革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

纪实文学《史无前例的岁月》（陈有唐，小说阅读网，2007）通过一家三代四口人的视角描写晋中交城县文革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不同地位人员的感触。例如描写“破四旧”时期的小城乱象：“仅仅这一天全城被揪出示众的竟有140多人，群众说：‘八二五，帽子满天舞。’整个县城里的人躁动不安，像发了酒疯似的。凡有说道的、平时穿戴出奇、不满运动的人、全要揪出来发泄、出气，闹腾得全城浑汤浊水的——公安局的人说，这是群众专政，他们有责任帮助维持秩序，使得乱揪乱斗的浪头一浪比一浪高一——”

一些博客文章记录了晋中地区多次武斗事件，例如马卫平《中阳县两次武斗事件亲历记》（作者博客，2013）记述1968年“十三县联军打中阳”事件。

**阳泉市** 阳泉矿区党史办《中共阳泉矿区历史纪事》（阳泉矿区网站，2010）的文革十年部分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该矿区的文革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进展。

民间记述方面，可见当事人桃河居士博客文章，包括“反思文革五十周年系列”，以及关于阳泉市两次大规模武斗的叙述。

**晋东南** 赵瑜未能出版的报告文学《牺牲者》和他另外一些短篇较全面地反映了晋东南地区的文革过程，特别是红字号联字号两派历经两年之久的血腥战争，

回忆录写作方面以前“红字号”人员居多。一名文革前的中学教师、文革中参加“红字号”并担任领导职务而被关押判处无期徒刑的作者以“高兴每一天”等网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个人文革经历以及两派起源、争斗、以及最后的结局。

文革时的太行中学学生，后来成为“红字号”骨干的程德胜，也经历了多年的图国

之灾，在晚年撰写《那年那月》（自印本，2008），叙述自身经历且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

这场血腥战争成为一代、甚至两三代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一些作者采用更不一般的形式表达对自己灵魂的触动。柴然的叙事长诗《死无葬身之地》（作者博客，2006，曾收入《黑皮诗丛/我们的高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叙述陵川县“联字号”围剿“红字号”，“红字号”退守硫磺矿、吉祥寺等地据守，终被歼灭，作者父亲被对方打死的故事。在序中作者说：“整个春天、夏天，整个秋天和冬天/我都在构建这首痛苦的诗歌/写一个人的死。它已缠绕我17年”

县级文革方面，可见《阳城纪要》（佚名，天涯社区转载，2006），其中包括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内容。

中学文革方面，有刘建新《文革初期的武乡一中》（武乡政协网，2013），叙述从1966年四清工作队进驻到1968年底该校历史。

**晋南** 亦缺乏系统的叙述，一些资料以反映武斗事件为主。金戈铁甲《临汾武斗拉开序幕》（作者博客，2007）主要叙述1968年7月1日临汾武斗事件。作者为刚从河北移驻山西的69军干部。黄建常《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文史月刊》，2008年8期）叙述1969年“九大”期间同蒲铁路受两派冲击事件。

当年晋南永济县一位中学生韩江雪在其博客上发表《文革回忆录片断》（2012），叙述在学校参加文革，又涉入县城两派斗争、被对立派逮捕殴打，最后参军的故事。

**忻县** 忻县有位郜银林，原来忻县中学的学生。他和他的同学们致力地区文革资料的搜集，对忻县、忻县地区、忻县中学、忻县师范等地区 and 单位的文革过程均作比较完整的叙述，对运动各个方面，如四清、夺权、知青、教育革命，均有专文交代，对地区各县，如定襄、原平、五寨、五原、保德、代县，也尽量搜集了有关资料提供。这些资料均保存在他们的博客里，如郜银林“话说忻州”、李元中“lyz6492”、任复兴的博客。

**雁北、大同** 资料非常少。可供参考的有焦祖尧《难以抹去的记忆》（《文史月刊》，2008年4期）。作者是位作家，主要叙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大同市夺权以后

的两派争斗。

一位当年的应县中学学生写的《我所经历的应县文化大革命》（佚名，山西新闻网朔州频道，2012）叙述该县文革全过程，特别是在“破四旧”过程中到著名的应县木塔烧毁珍贵经卷的实况。■

## 【综述】

# 山东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山东部分》补遗

杜钧福

山东文革研究及资料收集首推齐晋华、张业赏等人的工作成果。丁龙嘉的一些文章也涉及山东文革中的主要事件。一些背景材料可见冷眼文革《山东的反右以及文革中的“右派翻案》（飞扬军事，2011），该文对一些历史问题及在干部中形成的宿怨有较透彻的分析。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可见如下资料：佚名《黎玉被撤职和山东权力争夺》（doc360个人图书馆，2017）、任全胜《山东“向明事件”始末》（《党史天地》，2006年1期）、赵淮青《华岗的卓越贡献和悲惨遭遇》（《炎黄春秋》2002年7期）、丁龙嘉《原山东省省长赵健民蒙冤始末》（《炎黄春秋》2012年10期）、李伟，王毅《“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炎黄春秋》2014年3期）等。

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率队到山东曲阜“破四旧”、大规模毁灭性破坏“三孔”文物，构成文革初期重要事件。迄今未见师大方面当事人对此事件的交待。曲阜当地目击者刘亚伟经调查，撰写了一些记述性文章，并以亚子、良子笔名出版《孔府大劫难》（天地图书，1992）一书，较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过程。此外尚见两篇学术文章：李先明《“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及其影响——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8期）引用一些资料，分析这次反孔运动对当地民众的

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周泽浩《文革中的第一次反孔运动》（地方文革史研究网，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11月号）叙述1966年11月北京和地方红卫兵冲击曲阜“三孔”，大量破坏文物的行为并研究了产生背景，以及和“破四旧”运动的关系。

关于山东文革主要事件也可参见以下网文：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王葆君的长文《山东“二三夺权”风浪》（共识网，2010）从青岛“八二五事件”开始，比较详细描写的山东省夺权过程。文革研究者文贝的文章中有些与山东有关，例如《文革中军管干部的困境》（博客中国，2014）

另有几个有关山东文革的资料性博客：王林香博客，主要从大字报选、家信等文件搜集文革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山东文革的。大荒堂主的高雷鸟语博客曾搜集“百封文革来信”，也不限于山东范围。这类博客的题材更加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

山东省大学文革方面，除张业赏关于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文章外，还有《山大文革琐记》（华西里博客）、《1967年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齐晋华博客）、《山东医学院的文革十年（1966-1976）》（泰山信息港，佚名）。还有一篇关于山东煤矿学院文革的，为一位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中层干部所写，见于南山松博客。这些文章均涉及文革初期情况，后期的学校合并、下放、复校等事件可参见《山东大学百年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有关章节。

学校搬迁事还见于史进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山东教育革命》一文。此文还涉及文革期间嘉鱼县两位教师提出的“侯王建议”，即将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大队办。这一建议经中央批准推广到全国实行，造成后果的评价至今还在讨论之中。

关于山东中学文革的，有关于临清一中文革的《文革不是传说》（南怀沙博客）。另有高扬《亲历者评“文革红卫兵”道歉——不得不说的史实》以平阴一中文革为例，说明造反派和保守派两种红卫兵的区别。

山东红卫兵运动资料甚少。原济南一中红卫兵刘伯勤曾在《炎黄春秋》2013年6期发广告向自己文革中曾参与迫害的老师道歉，他后来接受采访讲述了一些文革初期和“红八



月”期间打老师、斗同学、抄家等事件。

山东文革期间有几位另类人物或称异端人物。除张宗鲁外，还有一位项观奇，上海复旦大学1966年毕业生，分配到山东大学工作，介入当地运动，成为山东省造反组织负责人和思想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据说他有一种“半社会主义”理论，见《〈半社会主义论〉作者项观奇》（红岩，乌有之乡，2009）

山东师范学院有一位朱多锦，原来是文革参加者，但很快成为文革研究者，可能是最早的文革研究者之一。但文革是不兴研究的，所以遭到迫害。文革后成为著名学者、诗人。见杨政《文革时期的朱多锦》（学说连线，2004）

各地市地区文革资料：

**济南市：**有半湖居士的博客中有几篇《济南文革片忆》，另有署名 lvfanzi 的博客连载《文革中的济南》，以及刘世海《回忆我在文革中亲历的几件事》（《济南文史》2013年3期）及其在济南文史网上的几篇文章均为亲历者对文革中发生在济南几件大事的记述。

**青岛市：**青岛的文革发动和夺权都走在前面，在全国有影响。丁龙嘉《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炎黄春秋》2009年9期）对发生在1966年8月的青岛事件有详细的描述和评论。但此事件尚有许多细节尚待探讨，可参见青青鸟社区上的一些资料，如“隐身雾中”的《文革杂谈》。其他有关资料较多，但也比较零散。青岛知青网上有“多事无成”撰写的《青岛往事》，主要讲1966年的825事件和1967年的122夺权。另一重要文章是杨羊羊博客的《67军文革支左岁月》（2013），谈驻青岛的67军及海军在当地文革中的作用也涉及徐州问题。还有一位当过教师的苏永生先生，搜集青岛文革期间死难的教师名字，还在征求有关信息。

**淄博市：**淄博市邮电局干部秦永文《孝父河作证——秦永文革命回忆录》记述了作者参加文革的全过程。郭济生《周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事件（1966-1969）》为大事记形式。另有闲卧残阳博客有《山东博兴县“三七夺权”》和《山东博兴县清查“五一六”》博文。

**枣庄市：**刘立君的博客《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亲历文革中山东枣庄67年7·25

武斗》，及黄老道札记《1967年的山东枣庄“7·25”琐忆》，集中反映枣庄市武斗事件。

**昌潍地区：**《潍坊文革史略》（佚名，潍坊市情网，2009，收入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亦木子《昌潍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敏思论坛，2006）、《青州“文化大革命”》（佚名，青州商务网，2007）都大致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文革过程，青州即原益都县。佚名《文革期间的青州教育》（今日青州网，2014）主要讲文革对益都教育事业的破坏。安丘市党史研究室《安丘市的批林批孔运动》（安丘新闻网，2013）涉及批判袁升平及抗洪救灾等事。dycuijinhong《余音未了》（作者博客，2011），作者原是寿光一中学生，讲述去临沂支援那里的造反派在地区学习班受到审查事。

**惠民地区：**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有很简单的《中共惠民地区——“文化大革命”时期》（渤海春秋，2014）。与此地区有关的还有邢天才、杨再文、李晓黎《留在渤海大地上的思念——缅怀原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滨州文史第四辑）。景晓村原是渤海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但后来一直得不到重用，文革中又被诬蔑为山东“渤海战团”的后台而受到迫害。

**临沂地区：**作家王火的纪实作品《在“忠”字旗下跳舞》从一所中学的角度描写当地文革历程。文革期间临沂地区曾爆发省里掌权者组织的大规模武斗，成为一些网文的主题，可见踏雪寻梅《马陵山——从齐魏之战到文革武斗》（作者博客，2009）、佚名《文革中临沂地区的武斗》（百度贴吧临沂吧）、悠悠岁月《文革中沂蒙山区的武斗》（博客中国，2012）、dycuijinhong《寿光“飞虎队”在临沂》（作者博客，2010）。另有魏亚峰《文革年代在临沂》（68军204师战友及子弟联谊会，2008），作者是68军204师子弟，临沂武斗失败一方与枣庄同派人员合流，长期据守毗邻江苏的马陵山地区，被称为马陵山游击队。很多网文涉及此事。

**德州地区：**参见白若宏的博客，如《关于韦锦章的记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作者文革时是德州一中学生。他的博客还收集了一些其他有关材料如《山东文革人物》。

**济宁地区：**有一位雷运河，写了一部济宁地区文革史，以《运河惊蛰》、《另类文革

纪实》、《山东济宁地区文革传记》等不同题目在网上发表。作者似为文革经历者，持左派立场，描述该地区文革历程，从一开始到抓“五一六”，直至“十月政变”，还包括经济建设成就等方面甚详。另有一位苏鲁边河，当时为该地区（可能是鱼台县）一位中学生、文革参与者，在网上有长篇回忆录，主要叙述县城里的文革过程。

**泰安地区：**有李继政《我的文革日记》（泰山翁博客，2013）。作者当时是泰安二中学生，家在农村，父亲在济南工作，本人爱好文学，坚持记日记。发表的是1965年11月到1967年6月的日记，记述泰安地区乃至山东省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大事。例如与青岛事件同时发生的莱芜事件、1966年11月在济南发生的白马山事件（铁路事故）皆有记载。1967年济南的“二·三”夺权，作者也曾亲历并描述当时观感。另有新泰县一位公社干部周传金的回忆录《新泰县城关公社“四清”、文革回忆录》从基层干部视角描写该县四清及文革时期的一些事件。

**烟台地区：**烟台市的文革资料甚缺。所辖地区中值得推荐的有林润坤0615《文革中我所经历的文登两派斗争》（作者博客，2009）。作者当时为文登一中学生，描写从文革开始到夺权阶段前后的运动概况。

**聊城地区：**从四清到文革的1968年初的情况可见《聊城文革记忆——郭惠民日志选》（聊城新闻网，2012）。作者当时为中学生，曾深度涉入文革。

**菏泽地区：**闲卧残阳博客有《山东菏泽地区文革夺权》专门讲夺权问题。魏灿《文革忆旧》（共识网，2010）讲单县的破四旧及造反夺权过程。作者当时因文革爆发而小学毕不了业，到一个“新村”安置。文革前因该县经济落后，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安置，所以县里建了几个“新村”试图解决此问题。另此文涉及“鲁西南革命造反军”。这是单县在外地上技校的一些学生回乡组成的造反组织，但当地很有影响。另有前度刘郎博文《那些年的那些事》，叙述冠县文革过程。当时在河北方面支持下，反对王效禹一派在冠县一带也进行了激烈抵抗。■

## 【封面】

## 集叶成环，喻之为冠

邹行

拾秋天落叶若干，压平，风干，制成圆环。

秋色象征过去的历史，压平、风干和粘制的过程一如地方文革的历史写作：史料的甄别、知识的沉淀、架构的成型。圆环则寄托着我们对地方文革史未来的期望。

叶子代表地方各省区，竖立成环，预示着文革时期各省及地方史学研究地位之平等。其样貌不一，象征各省区的研究成果各具千秋。

一叶难成环，一省复一省，终成圆满，从而为文革研究加上一顶地方文革史的桂冠。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 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